

也斯的香港後殖民文學與論述¹

王家琪²

摘要：本文嘗試從也斯的評論及文學作品總結其香港後殖民論述的特點。首先追溯到他六、七十年代的早期文章，檢視他如何在對美國非裔藝術及拉丁美洲文學的關注中已經初步觸及後殖民議題。接著整理他援引來分析香港後殖民處境的理論資源，包括法農對被殖民主體的異化心理研究，香港被各種宏大論述收編再現的東方主義式問題，以及朝向後民族方向發展的後殖民理論。最後分析也斯的作家身份對後殖民論述的貢獻，討論《形象香港》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這兩部後殖民文學作品和他的論述或有所配合、或有所推進發展的關係，嘗試完整呈現也斯的後殖民香港圖景。

關鍵詞：也斯、香港後殖民、後民族、混雜、《形象香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¹ 收件日期：2019/11/18；修改日期：2020/03/21；接受日期：2020/03/23

²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and Literary Works of Leung Ping-kwan³

Wong Ka Ki⁴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features of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of Leung Ping-kwan by studying his academic writing and literary works. First, observation of his early column writings in the 1960s and 70s shows tha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colonialism portrayed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n, the paper combs through his academic writings in the 1980s and 90s and analyzes the postcolonial theories he used. They include Frantz Fanon's study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colonized subject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adaptation of Hong Kong in an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and postnational theories such as Homi Bhabha and Benedict Anderson. The last part of the paper studies Leung's postcolonial literary works, *City at The End of Time* (1992) and *Postcolonial Affairs of Food and the Heart* (2009),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academic and literary writings, and provides a complete study on his depiction of postcolonial Hong Kong.

³ Received: November 18,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March 21, 2020; Accepted: March 23, 2020.

⁴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Keywords: Leung Ping-kwan (Yesi), Hong Kong Postcolonialism, Post-nationalism, Hybridity, *City at The End of Time*, *Postcolonial Affairs of Food and the Heart*

一、引言：香港與後殖民論述

「後殖民」是香港文學的關鍵課題，八、九十年代在後殖民理論的啟導下，香港學者致力追尋香港的主體性。也斯（1949-2013）是在文化及文學研究上最早倡議香港後殖民論述的領航學者，又是香港後殖民文學具代表性的作家。1991 年起，也斯在香港藝術中心陸續開辦多個香港文化相關的課程，1993 年起在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開設「後殖民主義與香港文化」課程，這些課程講稿後來結集成《香港文化》（1995），⁵ 其時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等西方新興理論在香港剛剛起步，也斯率先挪用以闡釋香港文化。1995 年他替《今天》雜誌所編的「香港文化專號」集結了多篇有關香港文學與文化的論文，⁶ 其中李歐梵、潘少梅、周蕾等人的論文深入討論了香港後殖民問題，後來皆成為被反覆引用的經典論文。⁷ 在討論香港後殖民狀況時，許多學者都以也斯為其中一位代表作家，引用他的相關論文及分析他的文學作品。例如周蕾在分析香港後殖民自創的困難時，引用了也斯對香港文化身份的討論，⁸ 又認為也斯的詩作「積極生產及重造香港殖民性的根源……並於其中開闢它們

5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 年）。

6 梁秉鈞主編：《香港文化專輯》，《今天》，第 28 期（1995 年 6 月），頁 71-206。

7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潘少梅：〈後殖民時期，香港和女性寫作〉、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的香港後殖民自創〉，《今天》第 28 期（1995 年 6 月），頁 75-80、109-116、185-206。

8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97。所引的也斯的論文為〈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原刊《當代》，第 38 期（1989 年），頁 14-23。

的生存空間」。⁹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開首即引用了也斯的著名論文〈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並討論了其小說《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的後殖民意義。¹⁰ 朱耀偉討論香港後殖民論述與都市文學時，分析了也斯同一部小說，結尾引用了也斯的同一段話。¹¹ 也斯同時以作家的身份參與香港後殖民書寫，多部作品被視為香港後殖民文學的代表作，例如他的詩集《形象香港》（*City at The End of Time*, 1992）、《東西》（2000）、《蔬菜的政治》（2006）等等，小說如《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1993）以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2009）經常被論者由後殖民的角度探討。¹²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於七、八十年代的歐美興起，最初是由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歐美知識分子對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提出批判，從理論反思自身經歷的殖民和身分認同問題。後殖民理論的專長是文化政治，例如張京媛概括後殖民研究的四大課題：「批判東方主義」、「文化認同」、「對被殖民者的分析」、「對民族

⁹ 周蕾：〈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鈞〉，《寫在家國以外》，頁 128。

¹⁰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19-341。

¹¹ 朱耀偉：〈大城小說：後殖民敘事與香港城市〉，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253-270。

¹² 學者對這兩部小說的討論，見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 年）。學位論文可參考：梁志華：《從〈剪紙〉、〈煩惱娃娃的旅程〉論也斯筆下的都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1982 年）。Lin Li-ying, *History,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2008. 見第一章，“Memory and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Identity in *Cities of Memory, Cities of Fabrication*.”

主義的探討」，都是文化面向的。¹³ 其中重要的學者及著作包括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52）、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東方主義》（*Orientalism*, 1978）、史碧娃（Gayatri C. Spivak, 1942-）對底層研究（the Subaltern study）的批判、巴巴（Homi K. Bhabha, 1949-）提出的「混雜」（hybridity）等等。¹⁴ 「後殖民」一語的「後」既指時間上殖民歷史的完結，也指向價值意義上對殖民主義的反思和解除。¹⁵ 而「殖民」除了指英法等帝國統治的殖民地，也指全球化脈絡之下以美國為首的文化及經濟殖民，即所謂的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¹⁶ 晚近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倡議擴展「殖

¹³ 張京媛：〈前言〉，《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1995 年），頁 14-19。

¹⁴ 這些後殖民理論不少繼承了後結構主義的學術遺產，因而被批評其政治姿態實際上是反動的，高雅的法國理論令其分析深奧複雜，脫離了第三世界面對的後殖民處境和批判實踐。參考吉爾伯特和德里克的批評，前者見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陳仲丹譯：《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16-22。後者見德里克（Arif Dirlik）著，馮奕達譯：〈全球現代性與殖民〉，《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臺北：衛城，2018 年），頁 54。

¹⁵ 張京媛：〈前言〉，《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9-13。

¹⁶ 例如陶東風把殖民關係的發展概括為「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這三個階段，殖民主義隨著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個殖民地獨立而進入新殖民主義的階段，標誌著美國霸權的崛起，也顯示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控制並未簡單結束，而後殖民主義區別於前兩者，主要是探討殖民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關係。陶氏為求簡單明瞭而把三個殖民關係的階段描述為直線發展的狀況，但值得注意的是「後殖民」和「新殖民」實際是同時存在於不同地區的。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2000 年），頁 1-4。

民」一詞的用法，認為當下更值得關注的是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殖民行為，尤其關注中國問題。¹⁷ 德里克的觀點對於理解香港獨特的後殖民處境問題非常有啟發，因為香港的解殖（decolonization）問題不只是傳統後殖民理論框架之下與宗主國（英國）的關係，還包括與民族母體（中國）的關係，而且後者才是九十年代以來較多學者關注的範疇。

後殖民主義在香港風行一時，無疑是學者就著回歸問題的思辯應對，而西方後殖民研究者返歸自身母國經驗的傾向有助香港學者反思本土經驗，同時也令他們意識到民族主義並非香港需要的答案。香港有不少異於一般後殖民理論探討範圍的問題，令香港成為很有價值的後殖民研究個案。就理論層面而言，後殖民理論主要關注歐美帝國及其殖民地，溢出「西方壓迫東方」框架的殖民行為沒有被正視，未可直接處理在世界範圍上正在發生的其他殖民行為，¹⁸

¹⁷ 德里克認為後殖民理論興起以來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等同起來，這是把「殖民」的意思窄化了。「殖民」原指拓殖和移居，「殖民主義」最終是指一些特殊的壓迫形式，因此除了大家熟悉的「帝國殖民主義」之外，更應該涵蓋民族國家內部的殖民行為，論證殖民是內在於民族建構、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德里克：〈全球現代性與殖民〉，《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頁 58-75。

¹⁸ 楊芳枝：〈挑戰文化主義，挑戰「中國」：堅持基進啟蒙精神的德里克〉，收入德里克著，馮奕達譯：《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頁 37。另外可參考廖炳惠對後殖民主義在亞洲地區適用性的批評。廖炳惠：〈在臺灣談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 年），頁 68-69。周蕾也提到類似觀點，她認為東亞研究為西方的後殖民理論提出不少難題，例如除了臺灣以外「沒有一個東亞國家曾長期被舊歐洲殖民勢力所佔據」，人們保存固有的文化傳統，未被西方文化取代，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實力也令他們與許多貧困的第三世界國家難以相提並論，另外日本更曾經是帝國主義者。「這

像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就政治層面而言，香港甚至說不上「後殖民」，不僅在 1972 年就在中國的要求下自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被剔除，1997 年後歸還給中國，與其他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統治後獨立建國完全不同，¹⁹ 也沒有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對抗殖民主義。廖炳惠甚至稱香港為「不可能成為後殖民的殖民地」。²⁰

九十年代以來，大量香港學者投身建構香港後殖民論述，力圖理解香港殖民歷史、勾勒香港過去在地區中的角色、建立本土身份認同，由文學、文化、歷史等層面對「回歸」中國帶來的問題。陳智德概括九十年代香港後殖民學者的兩大關注面向，「一方面對『大中國』式的宏大論述感到疑慮，另方面對如何書寫、呈現香港感到焦慮」。²¹ 朱耀偉總結九十年代香港後殖民論述的幾個關鍵詞，分別是「邊緣」、「混雜」和「第三空間」，「香港的後殖民論爭到頭來變成了闡釋『邊緣』的焦慮」。他又比較香港和臺灣的後殖民討論，認為兩地的焦點不同：臺灣在統獨之爭的角度下直接探問「中國性」的問題，香港則是「在『中國性』的大論述之下談『邊緣』、『他者』、『混雜』的觀念」。²² 不難發現，無論是採取上

些事例都讓典型的『東／西』、『被殖民／殖民者』的二元對立想法，變得過於隨便而無效。」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頁 92。

¹⁹ 羅永生：〈殖民主義：一個迷失的視野〉，《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3-4。

²⁰ 廖炳惠：〈在臺灣談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頁 69。

²¹ 陳智德：〈「回歸」的文化焦慮——1995 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與 2007 年的《今天·香港十年》〉，《政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16 年 6 月），頁 72-73。

²² 朱耀偉：〈誰的「中國性」？九十年代兩岸三地的後殖民研究〉，《本土

述哪種後殖民理論概念，「中國」都是當時香港後殖民論述最重要的「他者」。「邊緣」的說法往往與抵抗、反思民族主義「他者」勾連，一方面聚焦於香港被壓迫的弱勢位置，排拒作為他者的「大中國」，另一方面又把「邊緣」反轉成為香港文化的優勢，嘗試保存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例如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合著的《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回顧王韜以來旅港中國文人對香港的偏見，以及八十年代以來內地學者怎樣在民族主義的框架中編寫香港文學史。²³ 周蕾形容香港是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視中國為帝國主義殖民者，並以「第三空間」形容香港的「後殖民自創」，足以成為抵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要塞。²⁴ 王德威認為香港的城市文化能夠質疑和超越中國現代文學的「鄉土／國土」傳統，以邊緣和殖民地的身份偏處國族論述之外。²⁵ 除了從香港與內地相對的「邊緣性」立論，也有學者強調香港文化的「混雜」，與重視純粹、血統與根源問題的民族主義分庭抗禮。例如李歐梵認為香港相對內地雖是地理及政治上的邊緣，卻能「可以處在幾種文化的邊緣」，「從一個華洋雜處、中西交匯的環境中作不斷的創新」，以「雜種」的特色由邊緣挑戰中原，甚至在「後當代文化」中獨領風騷。²⁶ 無論

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年），頁271-272。

²³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見第一及第二章，（臺北：麥田，1997年），頁21-132。

²⁴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寫在家國以外》，頁91-117

²⁵ 持這個立場的論述可參考以下兩篇。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319-341。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編：〈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頁21-94。

²⁶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第28期（1995年6月），

是談「邊緣」還是「混雜」，背後仍是對民族主義他者的抗衡。此外，也有學者把香港置於世界殖民史中論述。鄭樹森把香港與英國其他殖民地比較，指出香港文化空間的特點，例如殖民地香港的對話對象是文化母體而非殖民宗主國，而且未有推行「語文上的殖民」，為英國殖民史上的異數。²⁷ 阿巴斯（Ackbar Abbas, 1942-）同樣強調香港在世界殖民史上的獨特性，²⁸ 指殖民主義是九七之前香港的歷史與經濟成就的主要部分，令主權移交具有「類殖民」（quasi-colonial）的性質，並指在後殖民處境下構築的香港主體性不是純粹的「本土」，應該是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及資本主義之間協商、變換

頁 79-80。

²⁷ 鄭樹森：〈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素葉文學》，第 64 期（1998 年 11 月），頁 14-21。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態〉，《素葉文學》，第 52 期（1994 年 4 月），頁 20-23。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素葉文學》，第 61 期（1994 年 4 月），頁 30-33。

²⁸ 阿巴斯認為香港有眾多不同於其他殖民地的特質，例如在殖民歷史以前不具備自身的歷史，九七前在各方面都比即將「殖民」此地的中國更先進，超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框架等等。他又以「（不）呈現的文化」（culture of disappearance）、「反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和「曾經消失」（déjà disparu）形容移交前夕充滿矛盾和弔詭特質的香港社會，在城市即將「消失」之前香港文化才獲得「呈現」。Ackbar Abbas, "Introduction: Culture in a Space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5. 術語的中文翻譯參考劉敏儀的譯法，見阿克巴·阿巴斯（Ackbar Abbas）著，劉敏儀翻譯：〈最後的「貿易王國」——詩與文化空間〉，收入梁秉鈞著，奧城（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年再版），頁 62。

與組合的產物。²⁹

也斯被視為上述「邊緣論」、「夾縫論」和「混雜論」的代表學者。1995年《香港文化研究》刊出的「北進想像」專輯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和反響，既能反映九十年代香港後殖民討論的焦點，也能反面說明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具有何等的影響力。羅永生、葉蔭聰、孔誥峰等年輕學者批評當時主要的幾位香港後殖民學者，針對「邊緣論」和「夾縫論」等說法，指該等後殖民論述是本質主義和總體化的，³⁰不只沒有勾勒出香港複雜的後殖民身份，更有與殖民主義「共謀」之嫌，也斯是其中一位被點名的主要學者。³¹ 葉蔭聰的文章〈邊緣與混雜的幽靈〉主要建基於對也斯的批評，針對也斯主編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號」中的多篇論文，點名他和李歐梵、丘靜美和周蕾的香港後殖民評論皆犯上不同的理論問題，而也斯的專輯前言顯示他正是以「邊緣」和「混雜」為線索組織專輯

²⁹ 他以「本土總是一個翻譯」（“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來否定自戀式的本土身份。“Introduction: Culture in a Space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p.11-12.

³⁰ 他們認為也斯等人「往往只聚焦在『香港的』的文化身份，因而忽略了其他文化身份（例如女性、工人、同／雙性戀者等）的重要性」，而且因為只討論文化層面，未有注意到「香港在資本主義政經文化的地區性霸權」。「北進想像」專題小組：〈前言〉，《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1995年9月），頁4。

³¹ 參考專題中以下兩文：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1995年9月），頁16-26。孔誥峰：〈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風暴看香港夾縫論〉，《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1995年9月），頁27-45。孔文在結集時文題略有改動。以上後來收入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另可參考多位學者對該次專題的回應，見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103-181。

中的論文。他認為也斯誤用了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的「大論述」概念來界定香港文化的「邊緣性」，³² 卻「往往對香港本身的大論述視而不見」，例如是「政經文化脈絡，即香港在國際與地區性的資本主義的位置」，而這正是整個「北進想像」批評的基礎和出發點。³³ 孔誥峰則針對「夾縫論」作出批評，同樣把也斯和周蕾等列為代表學者，指也斯想像香港處於眾多故事的夾縫裡，「在西方中心主義或大陸的中原中心主義下均被消聲和邊緣化」，在強調香港被壓迫的時候卻忽略了香港文化的壓迫性。³⁴ 類似的批評還有余麗文援引了大量後殖民理論指出也斯《游離的詩》「其中的自我／他者的二元架構〔……〕把身份、形象定論化（essentialize）」，對也斯「邊緣」及「夾縫論」的批評與上述葉、孔二文相近。³⁵ 無論這些批評是否公允，³⁶ 卻都證明了也斯的香港

³² 葉蔭聰認為也斯把李歐塔「大論述」（grand narrative）誤認為「曲折離奇的大故事」，但是也斯原文的意思應是指該等戲劇化故事背後的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大論述，不是指情節曲折與否，因此本文仍會沿用也斯的說法。參考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收入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 31-52。

³³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收入於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 34-36。

³⁴ 孔誥峰：〈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風暴看香港夾縫論〉，收入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 54-56。

³⁵ 余麗文：〈香港的故事：也斯的後殖民話語〉，收入黎活仁、龔鵬程編：《香港新詩的「大敘事」精神》（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 年），頁 163-190。

³⁶ 「北進想像」的批評針對香港的經濟實力和流行文化在區域內的影響力，然而並不就抵消也斯的觀察。前者談的是資本主義脈絡，即也斯稱為「大香港」的部分，他自己談的則主要是嚴肅文學藝術。加上由下文的討論將會看到，也斯的文學家本色令他和和其他後殖民學者關注政經、社會、歷史

後殖民評論的代表性和影響力。

回顧香港九十年代對後殖民的引入和反思，不難看到也斯在其中極為關鍵。他是香港後殖民論述的關鍵人物，在後殖民框架下探討香港文化身份認同，提出的論點廣被引用，其文學作品又是後殖民批評的主要案例，其重要性無庸置疑。論者多能並讀也斯的論文和作品，但主要是概括複述其論點以協助解讀其作品，尚未由理論高度全盤審視及總結他的香港後殖民論述有何特點。由這點著手，本文試圖檢視他在學術研究及文學創作兩方面對香港後殖民論述的貢獻，首先回到六、七十年代，追溯也斯如何在對美國非裔藝術及拉丁美洲文學的關注中已經初步觸及殖民與後殖民的問題。接著從也斯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評論，整理他援引的後殖民理論資源，以及他由後殖民的角度提出的香港文化特點。最後有見於也斯是在眾多香港後殖民學者中極少數兼擅文學創作的，本文會討論他被視為後殖民文學的兩部作品：詩集《形象香港》（1992）以及小說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2009），探討其中和論述或有所配合、或有所推進的關係。

二、對殖民問題的初步觀察：

美國非裔文藝與墨西哥的「解寂 / 解殖」

也斯對於後來被視為「後殖民文學」的西方文學現象已有相當早慧的意識。當時香港尚未引入後殖民理論，他主要是以文化和文

等的討論層面並不相同。也斯追求香港主體性的自我建立，「北進」批判雖然勇猛尖銳，但是致力拆解而不是建立，解構主義對於後殖民主體建構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學現象的角度來閱讀該等作品，卻無礙這些早年的閱讀經驗後來轉化為他對香港殖民地狀況的思考資源。

也斯曾經譯有《美國地下文學選》（1971），³⁷ 當時他已經注意到種族主義的問題。1968 年他曾經介紹美國非裔作家里奈·鍾斯（LeRoi Jones, 1934-2014），³⁸ 他頗欣賞鍾斯的著名劇作《荷蘭人》（*Dutchman*, 1964），「針對黑人向白人的文化、社會制度妥協的態度提出問題」，³⁹ 並指出鍾斯的創作原則，「力求維護純粹黑人風味的藝術，而把白人的批評準則扔過一旁」，他和同道的劇場不歡迎白人劇作家和觀眾，拒絕白人演出其作品，並批評部分黑人演員放棄為自己同胞演出而跑到百老匯劇場。也斯又曾介紹另一位美國非裔作家其菲（Eldridge Cleaver, 1935-1998）對於非裔文學的看法，其菲認為「黑人作家們都有一個道德的位置，而這是白人作家所無的」，黑人作家的文學成就應該建立在「一種戰鬥性的文學，需要用文字去陳述白人如何奪去他們的地位和尊嚴。」也斯嘗試回應這種觀點，認為種族歧視問題雖然真實而嚴峻，但黑人作家完全排斥白人的做法是限制了自己的作品。⁴⁰ 也斯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殖民」和「黑人主義」（*negroism*）等字眼，但顯然已經注意到相關的文學現象。

陳智德指出，香港社會內對殖民主義的反思，並不始自後殖民理論的流行。他把香港的解殖思考上溯到更早時期，認為五十至

37 梁秉鈞編譯：《美國地下文學選》（臺北：環宇，1971 年）。

38 鍾斯原名 Amiri Baraka。對於也斯曾經譯介的外國作家，本文一律使用他當時的譯名，而非今天通行的譯名，另註明姓名原文，俾便讀者參照。

39 也斯：〈「金龜婿」與「荷蘭人」〉，《香港時報》，第 10 版，1968 年 8 月 2 日。

40 也斯：〈兩位黑人作家的觀點〉，《香港時報》，第 10 版，1968 年 11 月 20 日。

七十年代香港民間本來就自發抗衡英國殖民統治，建立對「文化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已經體現出早期的解殖意識的覺醒。⁴¹在這背景之下，也斯對殖民的思考最特別之處是他並非從民族主義覺醒的角度出發，反而是關注香港的文化處境。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對拉丁美洲文學的閱讀。

他特別集中討論拉丁美洲民族文學的解殖和建立的過程。在《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的序文中，他介紹殖民地獨立運動之後的拉美文學，尤其著重指出拉美作家如何既汲取西方文化的影響，又結合拉丁美洲的本土傳統文化，創造出震撼世界的拉美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猶如在政壇上，他們是與外國並駕齊驅的獨立國家，不再是誰的殖民地了。」⁴²在《四季》第1期的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專輯中，他認為拉美文學和中國文學非常相似，「彼此都盲目摹仿過歐美的文學，使本國的文學成為外國的附庸，又因此而產生一派矯枉過正的人，盲目排斥外國文學」。⁴³這裡他同樣沒有直接用上「殖民」相關字眼，但顯然是在殖民與民族文化的二元框架之中理解拉美文學的發展，並期許中國文學能夠像拉美文學那樣，拒絕模仿西方或單純推崇民族傳統，而是走出自己的道路。

他更進一步把對拉美解殖的討論連繫到香港的處境。他在《大

⁴¹ 陳智德：〈「回歸」的文化焦慮——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與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72-73。

⁴² 梁秉鈞：〈當代拉丁美洲小說的風貌〉，《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臺北：環宇，1972年），頁5。

⁴³ 也斯：〈加西亞・馬奎斯與「一百年的孤寂」〉，《四季》，第1期（1972年11月），頁90。

拇指》介紹過墨西哥作家帕斯（Octavio Paz, 1914-1998）的書《孤寂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1950），⁴⁴ 並發現墨西哥和香港有很多可以比較之處。帕斯討論的許多議題後來備受後殖民批評家重視，例如墨西哥人在美國的情況後來被納入「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的理論框架之下，又例如他討論在拉美出生的印第安與西班牙混血族群（*mestizo*），都是後殖民批評的重點議題，雖然帕斯被指主要是以由哲學及文化價值的面向討論這些問題。⁴⁵ 也斯在這篇同名文章〈孤寂的迷宮〉（1976）中，⁴⁶ 像帕斯那樣主要由價值觀和文化層面閱讀墨西哥和殖民主義的問題，他先概括了帕斯的主要觀點，認為墨西哥人之所以陷於「孤寂的迷宮」，是因為墨西哥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尋覓不到過去的根源，在現代的世界中不清楚自己的位置」，而這種身份認同的困惑和空白，正是來自被西班牙殖民的經歷，「墨西哥人不願做一個印第安人，也不願做一個西班牙人。他否認這種混血的傳統。他否認自己的過去，而活在孤寂之中。」⁴⁷ 而墨西哥知識分子對此的解決方法就是重新認識墨西哥由殖民到獨立以後的歷史，返歸墨西哥古老的傳統文化，並改造殖民者的西班牙語使之成為屬於墨西哥的語言。⁴⁸

⁴⁴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translated by Lysander Kemp, Yara Milos & Rachel Philips Belash. New York: Grove, 1985.

⁴⁵ Oliver Kozlarek, *Postcolonial Reconstruction: A Sociological Reading of Octavio Paz*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pp. xi-xv.

⁴⁶ 也斯：〈孤寂的迷宮〉，《書與城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7-29。原刊《大拇指》第31、32及34期（1976年5-6月），與結集版本相同。

⁴⁷ 也斯：〈孤寂的迷宮〉，《書與城市》，頁24-25。

⁴⁸ 也斯：〈孤寂的迷宮〉，《書與城市》，頁26。

也斯由帕斯對墨西哥人的觀察聯想到香港，而這篇評論預示了後來八十年代其香港後殖民評論的重要特點。帕斯認為解除「孤寂」的方法，就是「解殖」，是建立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帕斯談到在美國生活的墨西哥青年（被稱為「帕諸高人」〔*pachuco*〕），他們擺盪於墨西哥和美國這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不能安於其中一種身份。⁴⁹ 也斯馬上接道：

香港或海外的中國人，不也是同樣處於兩種不同的文化中的擺盪者，同樣是感到難以適應嗎？當然他們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表現。⁵⁰

他認為香港的情況和帕諸高人相似，由此或者是暗示香港可以向他們學習解殖的方法。雖然也斯並沒有直接用上這些字眼，但其意思是相同的，所謂「撕開面具」、「面對自己」等等，就是解除殖民的影響、追尋和建立自我身份認同的意思：⁵¹

〔……〕知識分子感到的困惑最大；他們一向的觀念只是向歐洲和美國借來的，那些崇高的理論似乎與他們的現實格格不入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都跟他們的實際情況有了距離。所以最後他們必須自己去正視現實情況，要創造新的字匯、運用新的觀念，來討論面對的新現實。中國人的情況又何嘗不是這樣呢？〔……〕墨西哥〔……〕它得撕開面

⁴⁹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p.14.

⁵⁰ Octavio Paz,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p.18.

⁵¹ "Mexican Masks,"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pp.29-46. 無獨有偶，法農的名作《黑皮膚・白面具》也用上了「面具」這個比喻，帕斯是用以比喻一種封閉自我的退縮的心態，法農則指涉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問題，兩者略有不同。暫時沒有文本證據說明也斯當時就讀過法農（後來他的學術論文的確引用過法農），「面具」應該是借用自帕斯的。

具，面對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才可以真正的生活和思想，
但這時它也正是處在一種真正的孤寂中。⁵²

這篇文章有兩點值得留意，其一是也斯從墨西哥的例子意識到理論不一定切合在地的現實，他關注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問題，是從具體的文化觀察切入。這點與八十年代以後他對香港的討論相同，他的論述強項不在於引用大量的西方後殖民理論，而是他對香港文化的深入觀察。其二，他所思考的解殖問題同時是關於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未來的走向，應在西方的影響與民族傳統之間走出第三條路，而不是單純是談論香港。他把香港置於中國文學的脈絡之中，有別於八十年代以後的學術論文中，他把民族中國視為香港的關鍵他者。

「面具」的比喻成為也斯這時期談論香港的核心意象，他挪用並改造帕斯的修辭，顯示他嘗試把解殖的想法移用到香港的處境。也斯對「面具」意象的用法包含他自己的體會，所謂尋求面具背後的真我，他主要指文學形式的適用性，省察當下眼前現實的能力和身份認同反省的能力，與帕斯所指的已經不同。例如寫於此時期的中篇小說《剪紙》就用了不少「面具」一語討論人際溝通以至香港文化問題。又例如在〈孤寂的迷宮〉稍後寫的評論〈兩種幻象〉（1976），在思考模式和語彙上都受帕斯《孤寂的迷宮》啟發而轉借以談論香港面對的問題，其中也非常倚重「面具」的意象，期盼香港可以擺脫「面具式的文藝」，並像帕斯那樣歸結到需要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字，香港的作者「要尋找一種確切表現生活經驗的文字」，「僅是古典或西洋的言語不足以表達當前的經歷」，「從

⁵² “Mexican Masks,”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p. 28.

打破幻象開始，才可以面對真實，繼續找尋那適切的文字。」⁵³ 當他說香港的作者傾向模仿中國或西方的模式，「他要寫得像杜甫或艾略特，他也容易變得不要寫得像自己。他是蒙上面具，托庇於文字的荒原或意境的古道之上，他不要表露他自己，不要因此受到傷害」，⁵⁴ 就很明顯是借用了帕斯的意念：「一個戴上面具的人，放棄了表達感情和表達意見的權利，也就放棄了一部分自我。」⁵⁵。

也斯並把文學表現上尋找自我的困難，連繫到香港社會的問題。他討論在香港生活面對的種種文化與價值觀的問題，其實就是談論殖民制度引起的諸種問題：

一九四九年後在香港長大的一代，在他們長大的過程中，會發覺並沒有一種可以遵循的生活方式。逐漸長大時，會發覺這社會種種嚴重的缺點，很難無條件遵循。在教育方面，並沒有一套完善的教育制度，而是在唸書的過程，不斷改制，引起反對和批評，作了若干程度的改變，又妥協地繼續下去；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此地的傳統非常薄弱，縱接五四和古典或橫接西洋並不完全暢順，需要個人努力去打破阻隔；在個人和家庭方面，日常的禮儀都支離破碎了，既沒法完全接受傳統的中國禮儀，沒法完全移用西方的禮儀，也沒有真正建立起一種新的禮儀來，結果往往變成一些奇怪的混血產物，或是索性廢棄、或是淪為沒有意義的形式。⁵⁶

⁵³ 也斯：〈兩種幻象〉，《號外》，第15期（1977年11月），頁36-38。
原文先刊於《快報》1976年12月2至8日，《號外》版本在結尾的例子補充了一首黃德偉的詩。

⁵⁴ 也斯：〈兩種幻象〉，《號外》，頁38。

⁵⁵ 也斯：〈孤寂的迷宮〉，《書與城市》，頁24。

⁵⁶ 也斯：〈兩種幻象〉，《號外》，頁36。

在這段稍長的引文中，也斯談到教育、文藝、社會禮儀等幾種香港社會的問題，他或者沒有清晰的指出殖民制度是問題的來源，但是他認為問題的原因是中國的模式或西方的模式都不完全適合香港，斥之為幻象，這個想法就和後來他在學術論文中提出香港的「邊緣」和「夾縫」特點一樣。至於說香港並沒有自身的傳統可以繼承，正是在反思殖民地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

在其他地方，其他社會中，年輕人對老一輩的觀念反叛、妥協或反省，至少他們有一個崇拜或攻擊的明確對象。香港卻並非如此。面對的是一片空白、沒有回聲的空谷。⁵⁷

面對這種空白的困惑，香港青年只好模仿中國或西方的模式，以幻象權充現實。這裡也斯實際上已經涉及被殖民者受到異化（alienation）的問題，殖民的經歷構成了被殖民者的全部，殖民地香港被指在英國殖民者到來以前沒有歷史，香港常被譏為「文化沙漠」，沙漠一語同樣是「空無」的形容。同時殖民者帶來的文化改變了香港，殖民地的獨特位置令香港不同於任何中國城市。對於異化的問題以及也斯對香港殖民史的論述，下文將再詳細說明。

以上是在目前可見的材料當中也斯最早對香港殖民問題發表的觀點。在這些早期的文章中，雖然他尚未展開以上一系列的問題，只是以散文的形式和文學意象來討論香港文化，但他已經作出了敏銳的觀察，隱含了他在九十年代香港後殖民討論之中關注的課題，例如殖民經歷令被殖民者遺忘自身的歷史，以及創造自己的語言才能夠表達自己的文化本源和國家的精神等等。九十年代他提出撥開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對香港的刻板印象，說出真正的香港故事，背後的思考邏輯可以上溯至此，後殖民理論幫助他準確地表述早年就

⁵⁷ 也斯：〈兩種幻象〉，《號外》，頁 36。

體會到的問題。

三、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

也斯的後殖民論述主要關注的不是殖民地香港與宗主國英國的關係，而是香港後殖民主體性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民族主義是其論述中的關鍵他者，賴以界定香港文學的處境、特點和優勢。綜觀九十年代也斯所寫的香港文化及文學論文，他所探討的後殖民議題可以概括為三方面：（一）殖民體制對被殖民主體的扭曲、（二）香港發聲和再現的可能、（三）民族主義為何不是香港解殖的出路。以下會分別說明，並從中梳理他曾經援引的後殖民理論資源，分析他在挪用時如何對應香港的脈絡，嘗試指出其論述的特點。

也斯在〈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1993）簡單界定了他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理解：

後殖民的觀念可以是理論性的學術名詞，是深入研究和討論的課題；但在香港這個環境，也可以是非常切身的問題。切身的意思並不是說 1997 年以後，香港就不是殖民地了。很可能當香港名義上不是殖民地的時刻，人們仍然會帶著殖民地的意識。因為後殖民的意識，來自對殖民處境的自覺，自覺殖民處境造成對人際關係與文化的扭曲，造成種種權力不等的溝通和接觸。「後殖民」的「後」應該不僅指時間上的「後」，也指向內涵中的「破」，是對如何破殖民的反省。這種自覺可以始在現實政治改變之前，亦可以遠遠落後在現實政治之後。⁵⁸

⁵⁸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60。需要註明的是，此文最早為《香港的

他在註釋中引用了蘇赫特 (Ella Shohat) 的文章〈後殖民散記〉(“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1992) 以說明「後」在時間和價值上的雙層意涵，並較為重視價值層面的「後殖民」問題。蘇赫特該文其實是對「後殖民」一詞的尖銳質疑，提醒應該謹慎使用此術語。⁵⁹不過她不是全盤否定後殖民理論，她認為「後殖民」用以指涉反殖民批評以及第三世界國族主義 (third world nationalist discourse) 之「後」的理論建構最為恰當，以顛覆「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模式為特點，諸如後起的「混雜」等理論。雖然「後殖民」無力指涉政治或經濟層面的抵抗，但是對文化層面的殖民矛盾與含混的關係討論最為出色。⁶⁰

也斯對香港後殖民處境的討論恰好落在蘇赫特界定的後殖民理論應用範圍之內，例如他關注香港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夾縫狀態、文化身份的矛盾和含混等等，正好得到後殖民理論的支援。在另一

流行文化》(1993 年) 而作，本文引用的一節在最初的版本中只是「後殖民論述？」，其後收入選集《香港文學@文化研究》的版本擴寫成「後殖民論述抑或後現代論述？」簡體版本是也斯最後修改過的版本，重新整理了段落組織。雖然簡體版本有政治審查的問題（文章中的「香港」有時被改成「中國香港」），然而考慮到應該採用也斯最後修訂過的版本，此處仍然選用簡體版。

⁵⁹ Ella Shohat,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no. 31/32 (1992), pp.102-111. 她認為後殖民被用以指涉太多毫不相似的殖民狀況，如果用作統一的時空標籤，甚至無法涵蓋真正在後殖民鬥爭之中的民族，同時無法突顯獨立後的殖民地仍然不能倖免於第一世界霸權的困境。她建議對於第三世界的鬥爭狀況應該改用「新殖民主義」、「後獨立」或「第三世界」等語義清晰的標籤，因為「後殖民主義」弔詭地維持了殖民主義話語的中心性，是同時優待又疏遠殖民話語，也無法似其他標籤般指涉霸權及反抗。

⁶⁰ Ella Shohat,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p.108.

處，也斯同樣談到後殖民的雙層意涵，他把自己的關注焦點說得更為清晰：

後殖民（Postcoloniality）的思考不一定產生自殖民階段的結束，而是先要對外加的殖民式措施和論述帶來的限制有所自覺。要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一方面要思考與西方文化的異同，同時要連起思考香港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異同。⁶¹

事實上，最後這點「香港與中華民族文化的異同」才是他的論述中最為用力的部分，以下先看看他如何反思殖民主義的部分，再看他如何批評民族主義。

（一）法農的被殖民者心理研究與香港文化的問題

也斯對於被殖民主體的扭曲和異化體會很深。他的早期文章如〈孤寂的迷宮〉及〈兩種幻象〉等已經初步涉及香港的殖民地身世如何造成香港文化的嚴重問題。當時他主要關注文學形式的問題，表達的方式也近於散文。來到九十年代，後殖民理論幫助他準確地表述早年就體會到的問題。這方面他挪用的不是當時最新的後殖民理論，而是較早的法農。他援引法農的〈種族主義與文化〉（“Racism and Culture,” 1956）形容香港：「在殖民地香港長大，會不自覺地接受了殖民者所外加諸我們的價值觀，令某些原有的文化好像變成僵化，令我們對之感到麻木。」⁶² 在另一處又說：

從法農（Frantz Fanon）等論者開始，往往指出殖民者對被殖

⁶¹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22。

⁶²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62，註 1。

民者的傷害，往往不僅在財物、土地或肉身方面，也在心理方面。被殖民者認同殖民者，否定自己的文化、否定自己。這的確是值得思考的觀點。⁶³

否定自己、與自身文化產生異化等等問題，和七十年代初他所觀察到的「面具」與「幻象」問題一脈相承，可以說法農的理論為也斯早年對香港問題的觀察補充了學理基礎。以下先扼要概括法農的論點，再看也斯如何將其運用在對香港文化的剖析上。

〈種族主義與文化〉一文是法農在巴黎「第一屆黑人作家及藝術家會議」的發言，簡要地總結了他在《黑皮膚・白面具》的最重要論點，他以描述心理病的方式描述被殖民者心態的變化階段（phase）。法農先回顧了對被殖民者的研究最初是由宗主國開展的，以種族主義的邏輯利用科學知識合理化殖民。⁶⁴ 其後新的種族主義轉為文化形式，殖民者設立研究機構，企圖使之客體化（objectify）和「木乃伊化」（mummification），凝定在殖民狀態、古老的時代。被殖民者在這種結構之中沒有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他們不是主體。⁶⁵ 因此下一階段，被種族化的人民無可選擇，為了成為「人」、進入這套象徵秩序，唯一的方式就是認同、模仿並嘗試成為殖民者。他被異化（alienation），被告知他的不幸是由於其文化及種族是較為劣等的，他無條件認同殖民者的文化，否定自己的

⁶³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58-59。

⁶⁴ Frantz Fanon, "Racism and Culture," in Azzedine Haddour ed., *The Fanon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6), p.20.

⁶⁵ Frantz Fanon, "Racism and Culture," in Azzedine Haddour ed., *The Fanon Reader*, pp.21-22.

本土文化。⁶⁶ 法農期待的是最後階段，被殖民者會發現他的異化是費解和不合理的，他會起來反抗，全心投入他本來揚棄的本土文化，即使出於心理補償和被原諒的需要而過份肯定自身的文化，成為傳統主義者，帶著狂熱和挑釁性的展示癖（*exhibitionism*），但是鬥爭的意願最終能夠帶來國家疆界的解放。⁶⁷

法農的後殖民批評影響也斯頗深，構成了他對香港後殖民狀況的主要理解。他主要是引用被殖民者心理異化的部分來分析香港文化認同的「空白」，指出是殖民造成香港人對自身歷史與文化的隔閡。例如他說：

在香港從事文化評論，也許要回過頭去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為甚麼香港人許多時對香港的文化也不認識呢？這可能是幾種不同的殖民主義重疊的結果，令香港人也內化了這種作為「他者」的意識，對自己的文化鄙視、看不起、說不出口，甚至疏離而漠視其存在。在這種態度之下，是對自己的社會、文化、歷史沒有認識，壓抑了種種記憶與感情，而渴望認同其他的模式、其他的文化。外來者如果以無知的態度君臨香港，視此地為「文化沙漠」，自然無法認識此地的文化。⁶⁸

其中說香港人內化了「幾種殖民主義」對自己文化的輕視，與自己的身份認同疏離，因而全盤認同和模仿外來的文化，都顯

⁶⁶ Frantz Fanon, "Racism and Culture," in Azzedine Haddour ed., *The Fanon Reader*, p.25.

⁶⁷ Frantz Fanon, "Racism and Culture," in Azzedine Haddour ed., *The Fanon Reader*, pp.26-29.

⁶⁸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58-59。

然是化用了法農對被殖民主體心理的描述。而「對自己的社會、文化、歷史沒有認識」，正是長篇小說《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1993）的主旨：香港是一個「遺忘的城市」。⁶⁹我們還可以比較這段話和〈兩種幻象〉，「被殖民者認同殖民者，否定自己的文化、否定自己」以及「渴望認同其他的模式、其他的文化」，不正是〈兩種幻象〉批評的「面具」問題嗎？可見法農的理論有助也斯把對香港文化的體會納入後殖民框架中理解。又例如在《形象香港》他與譯者奧城的對談當中，他也以相似的字眼形容被殖民的感受：

奧城：香港的殖民經歷對你來說有何意義？

梁秉鈞：我把它想成無法表述自身的過去，表達對身份的困惑，以及形容自己對於此地的感受。這關係到教育，不平衡的文化政策，沉默與壓迫，還有對自己的背景脈絡的漠不關心。但也不只如此，它是我們做任何事情的背景。反諷地，香港作為殖民地為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另類空間，以其混雜反襯嗜好「純粹」和「本源」的問題。它組成了我大部分的背景，它在那裡，孕育我也限制了我，令我不安，提醒我的匱乏，令我很早就質疑一切理所當然的事情。⁷⁰

身份的空白、表述的失效和難以正視被殖民經歷等等，都可由法農的觀點闡釋。但是也斯的關注範圍超出了法農，「香港作為殖民地為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另類空間，以其混雜反襯嗜好『純粹』和『本源』的問題」，才是也斯最想證明的。也斯取自

⁶⁹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54。「煩惱娃娃的旅程」即《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原本構思的書名。

⁷⁰ 訪談原以英文刊出。Gordon T. Osing, "An Interview with Leung Ping-kwan." 收入梁秉鈞著，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頁222-223。

法農的，僅僅是其探討被殖民者心理機制的部分。對於法農信仰的民族主義鬥爭，也斯顯然認為不適用於香港。法農後來提倡知識分子應該積極介入政治運動，並呼籲由種族主義運動轉向民族主義運動，⁷¹ 這些也斯都沒有多談，也斯在其他論文中亦大力論證了民族主義不是香港解殖的出路，下文會詳細討論。

（二）「香港可以發聲 / 再現嗎？」

第二個也斯非常關注的後殖民議題，是香港的「代言」／「再現」（representation）的問題，最好的分析例子是他最著名的一篇論文〈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下稱〈香港的故事〉）。對也斯來說，香港「被再現」的問題不只是一個代言合法性的問題，亦是一個文學形式的問題，以下分別說明。

也斯分析香港在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敘述中如何被挪用、曲解、塑造，或可借用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來理解。雖然在這篇論

⁷¹ 法農後來又寫了《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1），其中〈論民族文化〉（“On Nationalism,” 1959）是很多後殖民論文選集的必選之作，文章思路基本承接〈種族主義與文化〉而有所反思，法農反對種族主義為邏輯的「黑人主義」運動（negroism），認為所有文化首先應該是民族文化，由種族（普遍化的「黑人」）到國族（具體、獨特的每個民族國家），本土知識分子必須建設民族文化才能和他企圖代表的本國人民重新融合，即使知識分子被迫被棄在西方獲得的所有文化資源和優勢，徹底歸屬他本來覺得並不足恃的母體文化。法農並認為知識分子光是利用「民族文化」等西方工具的不足夠的，他真正要做的是投入現實的政治鬥爭，先求民族解放，再談民族文化。Frantz Fanon, “On Nationalism,” in Diana Brydon e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vol. II, pp.443-469.

文中，他直接引述的後殖民理論只有史碧娃的屬下性（subalternity），⁷² 相比之下薩伊德卻更為接近也斯的用意。也斯這樣形容香港無法言說自身的原因：

大家爭著要說香港的故事，同時都異口同聲地宣佈：香港本來是沒有故事的。香港是一塊空地，變成各種意識形態的角力場所；是一個空盒子，等待他們的填充；是一個飄浮的能指（signifier），他們覺得自己才掌握了唯一的解讀權，能把它固定下來。⁷³

其中主要的有兩種大故事。一種是國際性都市的故事。後現代跨國企業的故事，繁榮安定的大事。〔……〕另一種故事是民族性的故事。〔……〕在兩種好像相反的故事中，香港都變成一種陪襯、一種邊緣性的存在，其功用不過是在闡釋

⁷² 「《遠大前程》……阿扁和愛斯達拉這兩個否定自己、追求他人價值標準、到頭來『兩頭唔到岸』的香港人，無疑是有許多故事可說的。關於屬下性（subalternity）、屈辱、疑慮等心理狀態，關於如何轉變、如何反省。」見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13。史碧娃關注的是知識分子自稱代表本國屬民的倫理問題，與也斯關注中國民族主義霸權及殖民主義異化之下香港無法發聲是不同的討論。史碧娃在〈從屬可以發聲嗎？〉把「屬民」嚴格限定為「處於文盲的農民、部族、城市亞無產階級的最低層的男男女女們」，她悲觀地認識到屬民永遠是無法發聲的，但是知識分子要做的是在認識到這點之後，對屬民承擔起倫理責任。引自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著，陳永國譯：〈屬下能說話嗎？〉，收入羅鋼、劉象愚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18。史碧娃牢牢地抓住階級的差異，也斯則沒有涉及階級的考量，他要談的其實是「文學再現」的問題。

⁷³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3。

說故事人某種曖昧的欲望與幻想。⁷⁴

也斯談論香港「被再現」的宿命，就像薩伊德談論福樓拜小說中的埃及妓女那樣。薩伊德挪用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對知識及權力關係的理論，認為「他者」或「邊緣」的再現模式是由權力操作的，因此他提出在東西方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東方無法表述自身，而只能被西方代言。「東方」是沒有實存的、西方話語的建構物，西方藉由建構出來的「東方」他者來確立自己的優越。沉默的、被代言的東方的塑造完全是依據西方的利益和需要。⁷⁵ 薩伊德分析東方怎樣被再現，和也斯上面那段話非常相似：

東方論述是建基於外在性（exteriority）上立論，即是說基於東方學家、詩人或學者在令東方說話，他們描述東方、為西方人將其奧秘變得淺白這事實。除了引發著述外，他們從不關心東方。正由於它是被述說和被書寫的，他們的所言所述，表明了東方學家乃身在東方之外，這是一個存在上的和道德上的事實。這外在性的主要結果當然是表述再現（representation）。〔……〕如果東方能表述自己，它自己也會做；但既然它不會，這樣的表述再現就為了西方做了它應做的事，在沒有更好的情況下，也是為了東方做了它應做的事。⁷⁶

薩伊德剖析「東方」是怎樣被視為空白的客體，因為缺乏自我表述的能力而任憑東方學家「再現」塑造和虛構，而該等「再現」

⁷⁴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11。

⁷⁵ 薩伊德著，黃德興、劉慧儀譯：〈東方論述・導引〉，收入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9-59。

⁷⁶ 薩伊德著，黃德興、劉慧儀譯：〈東方論述・導引〉，收入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解殖與民族主義》，頁 50-51。

是如何為殖民權力服務的，都很可以挪用分析香港在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論述中被再現的情況。但是有一點也斯和薩伊德非常不同，薩伊德聲稱他不是要尋找本質主義的「東方」，因為東方根本沒有「本質」；⁷⁷ 也斯卻是希望表述「真正的」香港，讓本地人奪回話語權。也斯關注的「再現」權力和合法性，對於香港文學的自我充權（self-empowerment）非常重要，尤其是後過渡期各方對香港的戲劇化想像，以及當時正面對內地官方領導的文學史書寫計劃對香港文學的扭曲和收編，⁷⁸ 這些都是他的論述的對話對象。

拒絕香港被外來者「代言」是也斯的主要訴求。例如他在〈香

⁷⁷ 關於薩伊德的自相矛盾和理論問題，見吉爾伯特：《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頁 46-74。

⁷⁸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指出在內地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向來是重要的政治任務，八十年代大量內地學者編修香港文學史無疑是為了香港回歸而進行的準備工作。這些文學史強調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血緣關係，過度高估中國來港作家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其文學史評價標準也跟從五四以流的現實主義框架，並把香港的商業文化歸咎於殖民統治。參考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第二章，頁 95-129。黃子平整理香港文學進入內地學者視野的過程，幽默地稱之為「不明寫作物體」，內地學者對香港文學的認識深受內地的文學潮流影響，而香港蓬勃發展的流行文學傳入內地，對內地文壇的衝擊不小。參考黃子平：〈「香港文學」在內地〉，《害怕寫作》（香港：天地，2005 年），頁 10-24。陳國球則研究眾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把香港文學納入其討論框架的幾種方式，包括收於附錄，尤如「可以隨時割棄的『盲腸』（appendix）」，又或是以「由『歷劫』到『走向光明』的情節」敘述香港百年歷史。他戲稱為「收編香港」，以指涉文化上的收編與政治上收回香港同步，卻因為兩地文學發展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造成文學史框架的失衡和混亂。參考陳國球：〈收編香港——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蜃樓：香港文學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21。

港的故事〉所批評的幾個電影及藝術文本，主要問題在於香港人只是被再現的客體，而不是自主發聲的主體。例如香港藝穗會與悉尼劇團合作的話劇《遠大前程》（1992），以香港為題的畫作例如劉大鴻《蝶戀花》（1993）和劉宇一《女媧之歌》（1994）、尚文西設計的1994年香港大球場開幕匯演等等。但是同時他又理解到本地人並不一定就懂得言說自身，因為殖民造成的異化問題太根深蒂固了。例如他在另一篇論文中曾以徐克和嚴浩的《棋王》（1992）為例，論證香港如何也可能「內化了外來的敘述」，他認為這部香港導演的香港故事也只是重覆殖民者和民族主義者對香港的刻板印象：

香港導演的這部電影作品裡，似乎正是無法說出一個香港的故事，說到香港的時候，又是內化了人家的濫調，再把香港說成一道聯繫的橋樑，把香港的角色，說成一種現實、進取、精明而又面目模糊的角色。⁷⁹

選取這個本來無關香港的故事，詬病「香港空間卻始終是缺席的」，⁸⁰乍看稍嫌強求，但電影的確刻意把張系國的原著角色程凌改成香港人，嘗試聯繫北京和臺北的故事。也斯認為電影改編顯示了「導演所投射的香港主體的尷尬」，⁸¹僅僅重覆了外人以為香港就等於發達這類來自傳媒和商業文化的定見。

也斯的討論方法是由文學形式思考文化「再現」的問題，探討

⁷⁹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230。

⁸⁰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229。

⁸¹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228。

香港如何能夠擺脫客體化的狀態，不是被再現，而是成為能夠充分發聲的、自覺的後殖民主體。不難發現也斯傾向把文化問題轉譯為文學問題。在後殖民文學、電影和藝術的特質之中，他最重視主體自省的表現，因此他特別推崇抒情電影，因為抒情電影正正是減低敘事成分、突出主體的情感和內省。他談文化身份問題總是很快跳到文學形式問題，例如我們可以留意一下也斯如何在批評各方爭說香港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之後，馬上把話題轉接到抒情電影的形式和香港的抒情小說；⁸² 在另一處他談論香港教育和文化政策問題如何阻礙我們反省自身之後，又連繫到怎樣的文學表達形式較適合再現香港，「可以通過翻譯、重寫、故事新編、借古喻今等種種手段。徐克和李碧華就是這樣做了。」⁸³ 又例如在〈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他談到「香港的身份比其他地方的身份都要複雜」，難以界定其「含混性和邊緣性」，他馬上把文化身份的混雜連繫到文學語言的混雜，以崑南的〈旗向〉為例。⁸⁴ 這些都可見也斯的文學家本色，和其他後殖民學者主要討論文化、社會、歷史等有所不同。

要言之，〈香港的故事〉全文結構建基於「抒情／敘事」、「本地／外地」這兩組彼此相關的對立項。以「抒情／敘事」的對立來討論香港文化表述是也斯獨特的創見，可以引申兩個問題：一是這種形式特點和也斯個人的美學偏好的密切關係，輕易可以延伸至討論他的詩文作品，以及他偏好的王家衛、方育平等導演；如果以之

⁸²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5-6。

⁸³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18。

⁸⁴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36-37。

檢驗九十年代香港的電影、藝術、文學等等，則未必是一個普遍的美學現象。二是「反敘事」的立場雖然出於關注被殖民者能否發聲的問題，但是在「破」之後也需要思考「立」的問題，而「反敘事」只能是「破」除東方主義式表述的權宜之計，在建「立」香港主體、表述自身時則不宜也無法固守。至於「本地／外地」的對立，雖然也斯澄清自己的說法並非排外，本地人也可以內化了外地人說的香港故事，⁸⁵不過其實在這樣的澄清裡面仍然是維持著內外的對立，外來者仍然被視為殖民主義論述的來源，大致上代表了也斯以至不少九十年代香港後殖民論者的「邊緣論」和「夾縫論」論述策略。這個二元對立的論述僵局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以「混雜」代替「邊緣」的時候得到超越，推進了他的香港後殖民論述，本文最後將再詳論。

（三）民族主義不是香港的解殖路徑

民族主義的問題是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中最重要、所花力氣最多的部分，相對而言，他對殖民主義問題的探討只是佔一小部分。⁸⁶早在六七十年代，也斯已經表現出對民族主義的疏離。例如他對於當時新詩返歸民族傳統的訴求不以為然，反而認為應該更集

⁸⁵ 梁秉鈞、張美君、洛楓、葉輝對談，魏家欣、郭麗容紀錄及整理：〈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收入梁秉鈞著，Gordon T. Osing、梁秉鈞翻譯：《形象香港》，頁 263。

⁸⁶ 例如余君偉曾批評比起堅拒接受民族主義收編，也斯對英國殖民者反而顯得缺乏批判，顯示他「對白人神話的溫厚」。余君偉：〈家、遊、行囊：讀也斯的游離詩文〉，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文化研究》，頁 158。

中地表現香港本身。⁸⁷ 來到九十年代，他對民族主義的抗衡仍然繼續著。

民族主義是後殖民理論的關鍵課題，較早期的後殖民批評家如法農視民族主義為第三世界國家解除殖民的出路，既是團結被殖民者進行反殖鬥爭的有力號召，又能療救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對他們造成的傷害。晚出的批評家則對民族主義變得警惕，同時後殖民理論由傳統的「帝國主義宗主國——殖民地」關係研究，轉而朝向「後民族」（postnationalism）的方向發展。民族主義的悖論在於它本身就是十八世紀歐洲的話語，殖民地的征服、擴張、「啟蒙」正是歐洲諸帝國的民族主義在推動。因此第三世界國家借用民族主義為武器，不免仍是被籠罩在西方的陰影之下。⁸⁸ 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說殖民主義是內在於民族主義的，德里克就認為現今更常見的「殖民」形式早已不再是「一國對另一國的壓迫」，而是民族國家為了建立國族認同而壓迫國內的弱勢社群或原住民、統一其語言、文化風俗、宗教等等，這些殖民行為甚至比帝國殖民主義更為粗暴，「跟它們的帝國前輩比起來，對多樣化少了許多寬容」。⁸⁹ 同時又因為後殖民理論繼承了後結構主義的遺產，他們批評民族主義是本質化的、總體化的，反之推崇差異和多元。⁹⁰ 多位理論家如安德森（Benedict

⁸⁷ 參考王家琪：〈也斯的香港七十年代新詩論述——以臺灣現代詩檢討風潮為燭照〉，《臺灣文學研究》，第 11 期（2016 年 12 月），頁 93-142。

⁸⁸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頁 133-136。

⁸⁹ 德里克舉出的國際例子包括中國對維吾爾族與藏族的統治、土耳其與庫爾德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等等。德里克著，馮奕達譯：〈全球現代性與殖民〉，《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頁 61-65。

⁹⁰ 章輝：《後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18。

Anderson)、薩伊德、巴巴、史碧娃等，從不同的角度反思民族主義。

也斯對民族主義的看法較為接近這一派「後民族」思路，故此對於法農，他迴避了其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聚焦於對被殖民者的心理分析。但是也斯的立場不能簡化為「反中國」，他並不是主張香港與中國文化的徹底斷裂，而是強調香港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選擇性承傳。⁹¹ 在後過渡時期，不少香港後殖民學者以否定的態度面對中國，他們質疑回歸的官方敘述，甚至認為中國無非是另一個殖民者，視香港為對抗「原鄉中國」神話的據點。⁹² 也斯沒有以視中國為另一個殖民者，⁹³ 他認為香港的優勢在於能夠與民族主義論述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也斯主要是提出兩點：（一）必須警惕民族主義扭曲和誤解香港的部分；（二）在中國文學系統之中尋找和論證香港文學的特質，而其中一個香港特質就是保有對民族主義大論述的質疑和反思能力。以下分別詳細說明。

也斯認為如果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民族主義是讓他們找回自己的主體性，去除殖民主義留下的文化遺害，那麼對香港而言，

⁹¹ 「香港不是一個顛覆基地而是選擇性地繼承了一些東西的邊緣都市，而那些東西是中國到了八〇年代重新正視或接受的東西。香港因緣際會處於一個邊緣空間因而做了一些事情。」也斯、陳智德：〈文學對談：如何書寫一個城市〉，收入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分）》，頁 17。

⁹² 持這個立場的論述可參考以下兩篇。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19-341。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頁 21-94，見第一章「中國人說的香港故事」。

⁹³ 這點與周蕾的立場比較就更為明顯，她稱中國為帝國主義殖民者，相當重視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質疑與抵抗。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頁 91-118。

民族主義反而阻礙香港尋找自己的主體性。他在〈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中指出：

但香港的處境，又跟一些其他發展出後殖民論述的國家處境並不一樣。因為香港文化的問題，不見得回到一個中國民族文化的模式就可以解決。香港的歷史文化不見得如印度的史學家那樣以一個民族歷史的角度就可以闡釋清楚。不光是內地的民族主義論者往往把香港視為西化而抹煞了香港文化，臺灣鄉土論述如尉天聰的〈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甚麼？〉一文，也以民族主義宏觀立場，無視於香港實際複雜處境，而拋出一些概念化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一類批評，隔岸觀火，胡亂指指點點。同樣，借用後殖民的理論，結果反用以否定本地的創作，或又一次用新的（即使是第三世界的）模式，來壓抑了本地的論述，這也是值得擔憂的現象。⁹⁴

要言之，就是也斯認為民族主義者長期以來只是誤解和扭曲香港文化，無助於香港建立後殖民主體，因此香港的解殖之路不能走向認同民族主義。引文中提到「印度的史學家」，應該是指支持印度民族主義史學家如古罕（Ranajit Guha, 1922-）認為印度人要從英國殖民者手上奪回撰寫歷史的權力。⁹⁵ 也斯強調的是「香港卻不能光透過中國民族／中國本土文化去維護本身的自主性，而不損害或

⁹⁴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56。

⁹⁵ 後殖民學者查格巴堤（Dipesh Chakrabarty, 1948-）則批評這種史觀掩蓋了印度內部多種族多文化的差異，認為在拆解「歐洲」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要質疑「印度」這個觀念。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s?" *Representation* 37 (Winter 1992), pp.1-26.

放棄香港特有的歷史」，⁹⁶ 民族文化不只不能協助香港建立後殖民主體，反而是壓抑香港的主體性。

也斯認為香港正好是質疑民族主義的最佳發言位置，能夠提供獨一無二的後殖民案例，說明「去殖民」不必就是「民族化」，並嘗試借用安德森和巴巴的理論拆解民族主義論述。他的論據是電影文本分析，對這問題談得最完整的論文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此文是在第 15 屆國際電影研討會論文，該次會議主題是「民族電影再思」，他當時曾經寫下一篇散文記述研討會所感，在會上提出民族電影的學者都來自曾經被殖民的國家，「來自香港的我，自然就不免擔心——一種大一統的民族電影，會不會壓抑了其中參差不同的聲音？」⁹⁷ 反觀第一世界的學者則大談「混雜性」，他也不認為可以完全解釋香港。⁹⁸ 在他自己的論文中，他指出當時西方的後殖民討論關注第三世界國家在解殖以後如何重建民族文化，例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 -）「國家民族寓言」，但是他認為這種論述策略不適用於香港：

但這些討論未必足以涵蓋後殖民狀況的複雜性。以香港為例，一方面逐漸離開殖民地的處境，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也並不是完全認同一種國家民族的文化。要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恐怕正得從它與國家民族文化認同又有相異之處開始細

⁹⁶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頁 98。

⁹⁷ 也斯：〈民族電影與國際化雜拼之間〉，《越界書簡》（香港：青文，1996 年），頁 147。

⁹⁸ 也斯：〈民族電影與國際化雜拼之間〉，《越界書簡》，頁 150。

探。⁹⁹

對於香港為何不能夠完全認同民族主義，除了他在其他論文已經提及的原因之外，他又以《霸王別姬》（1994）說明民族的角度如何壓制香港主體，借香港電影補充〈香港的故事〉提出的問題。北京導演陳凱歌改編香港小說家李碧華的作品，為了說一個國家民族寓言，香港（以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代表）被邊緣化、沉默、成為被觀看的客體：

這齣由內地與香港合作的電影，香港演員張國榮的反串成為矚目的焦點。但另一方面，也正如前述，成為一個邊緣的景觀，近乎啞默的被觀看的「美」，好像被同情的「受害者」而非能自我表白的主體。這人物和角色，正如敘事中的「香港」，都被刪除或邊緣化了。在這一部被稱為香港的電影中，香港正扮演著曖昧的角色呢。¹⁰⁰

也斯認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已經質疑中國的國家民族觀念，又引用後殖民理論家對「民族」概念的質疑，包括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以及霍米·巴巴的〈散播民族：時間、敘事與現代民族的邊緣〉（“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1990），¹⁰¹以說明民族觀念是過時而正在瓦解的。他認為這些對民族概念的不信任是香港的出身給他的批評觸覺，是他眼中香港具有後殖民理論價

⁹⁹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18。

¹⁰⁰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27。

¹⁰¹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20-221。

值的關鍵，認為香港可以補充部分理論家對民族主義的盲目信任。

但是也斯並不是把中國與香港視為互不相容的立場，相反他是在中國文學系統之中尋找和論證香港文學的特質，說明香港與民族文化既同又異的部分。他認為香港一方面保有對民族大論述的反省距離，另一方面又承傳了非主流的中國文藝。他以關錦鵬《阮玲玉》（1992）為例，這部電影採用的間離手法疏遠左翼現實主義電影為代表的「民族電影」和「進步電影」，反而更為欣賞一直只是中國電影支流的「抒情性」，與也斯在上述〈香港的故事〉一文提出的「抒情／敘事」對比一致。也斯認為這可以與香港文學選擇性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學的角色作類比，在「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大香港」的商業文化以外「尋找另外的態度」，¹⁰² 就像香港另有角度審視中國文學，正是這點體現了此文開首他要探討的香港「與國家民族文化認同又有相異之處」：

這也是一個香港的角度。相對於上述大中國和大香港的角度，五〇年代以來，香港一直也有不少人斷斷續續在主流以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賞中國電影。〔……〕可見新一代人對五四主流以外的另一支傳統的欣賞、繼承與開展，雖屢屢在粗暴的評論中被抹煞，卻是存在的。¹⁰³

這段話還可以反映出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的三個特點：（一）其中的「兩個香港」相當引人注意，一個是必須抨擊的商業掛帥的香港，另一個是作為也斯主要研究對象的香港。這個「分裂的主體」

¹⁰²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33。

¹⁰³ 也斯：〈民族電影與香港文化身份——從《霸王別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香港文化十論》，頁 235。

對於理解也斯的香港文化及文學研究很重要，他思考的後殖民問題，僅僅是針對後者。有評論者詬病他討論香港文化的取樣問題，¹⁰⁴但這也正是這點突出他作為一位文學研究者的特點，他關心的不是香港在商業文化上的表現。（二）他所說的「主流以外」的另類角度，並不同「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第三空間」是巴巴發明的術語，周蕾用以「說明在殖民者與主導的民族文化之間，存在於一個第三空間。」¹⁰⁵也斯在一篇英文論文中引用過「第三空間」形容香港在殖民者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間協商出自我書寫的空間。¹⁰⁶有趣的是，到他在中文論文裡面談到香港文學自我協商的生存空間時，協商的雙方內涵就不同了。¹⁰⁷他最重視的抗衡空間不是在殖民者與民族主義者之間，而是改成在民族主義者與商業文化之間，開拓香港文藝的生存夾縫，他說的「商業文化」沒有上升到資本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理論高度，而主要是着眼於嚴肅文藝的生存

¹⁰⁴ 例如葉蔭聰就質問為什麼也斯概括地說香港的說書人無意追逐香港的大故事，而把積極地說大故事的香港作家如梁鳳儀排除在討論之外。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 34-35。

¹⁰⁵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寫在家國以外》，頁 102。

¹⁰⁶ 在該英文論文中，也斯認為香港現代主義詩人無法簡單認同民族主義或殖民主義，而驅使他們在兩者之間協商「第三空間」來追尋自我書寫的合適方式，香港的主體性應是來自這個協商和自我書寫的過程。Leung Ping-kwan, "Modern Hong Kong Poetry: Negotiation of Cul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 (1996), pp. 221-222.

¹⁰⁷ 造成這種內涵落差的原因，可能是中英文論文的對象和發言目的不同，英文論文面對香港以外的讀者，傾向從較宏觀的後殖民角度說明香港歷史與文學的特質，中文文章面對本地讀者，較深入地討論本地文學生存的困難。

空間。¹⁰⁸（三）他把香港身份的優勢，建立於香港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上，而香港與民族主義的疏離正正是香港最寶貴的地緣優勢和理論價值。這點可以說是他的香港後殖民論述的骨幹。

香港是否如同不少後殖民論者所說的不信任民族主義，已經引起不少爭議，例如歷史研究就說明了不同的史實。¹⁰⁹但在回歸前夕的後殖民討論之中，反民族主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至今這種論述仍然深深地影響香港文學研究。嚴格來說，也斯並沒有真正討論香港的民族認同問題，而是認為民族主義必然不適合香港，力抗對香港文化的任何扭曲。除了也斯討論的這一面之外，香港文學之中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嚮往也很值得補充，納入香港文學史的框架之中討論，連同也斯討論的部分共同帶出較全面的不同年代不同立場作家的香港文學的認同狀況。¹¹⁰套用法農的話，被殖民者的抗爭邏輯早已被銘刻在殖民主義之中，但是歷史現實也不容許他們有另外的抗爭方式；以也斯為代表的一批香港學者把香港界定為夾縫和邊緣，我們固然可以後見之明批評他們只是順應殖民者和民族主義者對香港的看法，把香港定為受害者，取消了香港作為主體的抗衡

¹⁰⁸ 也斯：〈無家的詩與攝影〉，《娜移》，第2.2期（1993年2月），無頁碼。
也斯：〈在香港寫小說〉，《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1996年），頁147-151。

¹⁰⁹ 香港華人與民族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合作關係，可參考以下兩書。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2013年），頁80-106，見第三章「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¹¹⁰ 例如可以補充香港作家對民族認同的看法。可參考王家琪：〈從八十年代初香港作家的中國遊記論本土的身份認同——以《素葉文學》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50期（2015年10月），頁77-116。

的能動性，¹¹¹ 但是考慮到中港文化系統的強弱懸殊，那或者是當時最自然的論述策略了。而也斯對民族主義抹平差異的警惕，還有對多元混雜的強調，正好符合後殖民理論的發展趨勢，當然這點他在文學作品中有更精彩的表述，下一節將接續討論這點。

九十年代香港學術界在面對回歸問題時大量借用後殖民理論，不少評論者都認為香港的後殖民處境非常獨特，因而不能直接挪用西方的後殖民理論。由也斯的個案來看，他主要關注的是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香港和英國。當時學術界在探討香港後殖民問題時，這個傾向也相當明顯，尤其是就文化和文學層面而言，香港文學和中國的關係遠比和英國的關係重要。後殖民理論對於拆解民族主義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支援了他論證民族主義不是適用於香港的解殖方向，同時令他警惕再現和權力的關係。後殖民理論思考弱勢文化在殖民統治結束之後如何建立其主體性，有助他思考香港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留心後殖民主體的建立多麼困難重重。

正是在抵禦民族主義的意義上，後殖民是理解也斯的香港文學研究的鑰匙。在其論述邏輯之中，民族主義成為了「香港」的關鍵他者，賴以界定香港文學的處境、特點和優勢。也斯提出的香港文學論述不少能夠與內地評論家的看法對應起來，尤其是他的香港現代主義與都市文化研究。透過對香港都市文化的討論，也斯企圖說明香港在文學上比中國發展得更早更前衛，顛覆民族主義者對於殖民地文化和文學的鄙夷。這些文學史觀點，和他對民族主義的立場

¹¹¹ 這類批評以羅永生為代表，他的博士論文對於香港的殖民歷史、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共謀」關係提出了精闢的分析。可參考羅永生：《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頁 235-278，第八章「北進殖民主義」以及結論「在香港再思後殖民理論」，對九十年代的香港後殖民論述有很尖銳的批評。

密切相關，是他的香港文學史論述中的重要部分。此外，他關注香港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卻跳出「香港文學是中國文學支流」的官方框架，提出香港文學雖然有傳承中國文學的部分，卻是選擇性的繼承，而排斥現代文學主流的現實主義。他更努力論證香港這塊邊緣的殖民地如何改變了來自中原的南來文人的正統文學風格，包括他對馬朗、劉以鬯、宋淇、吳興華的研究，背後仍然是同一個「邊緣啟發甚至改變中心」的論述。¹¹² 由這個框架還可以引申至香港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一直保持討論和出版所有立場的文學作品的自由，就像劉以鬯《酒徒》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很多只有當時的香港能夠討論，¹¹³ 而也斯自己亦曾撰文討論中國現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以外的作品，例如現代派新詩和抒情小說。¹¹⁴ 這些都可以追溯到他對民族主義的後殖民立場。

也斯的後殖民論述是一名文學家所做的文化研究。由以上整理也斯援引後殖民理論的情況來看，他更多是提出自己對香港文化的觀察和體驗，運用理論時不同一般學術論文寫法，大部分提到理論之處只有一兩句的篇幅，反而更著重表達自己的經驗和觀察，展現出作為文學家的文化感性和敏銳觸覺。這點或者和他對「越界」評論的信念有關。他的「越界」除了指越過自己的原生文化界線去接觸異文化，也指越過學科的界線，建立一種跨文類、跨文藝、跨文

¹¹² 也斯：〈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新詩的承傳與轉化——論宋淇與吳興華、馬博良與何其芳的關係〉，《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2013年），頁57-79。

¹¹³ 也斯：〈香港小說與西方現代文學的關係〉，《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頁109。

¹¹⁴ 梁秉鈞：〈中國現代抒情小說〉，收入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新貌》（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頁117-135。

化的比較文學視野。¹¹⁵ 因此「越界」主要是浪漫的文學隱喻和一種批評的視野、能力與位置。上文所論的文章最初多收錄於《香港文化》，他認為此書就是「越界」的嘗試：

書出來以後搞創作的人覺得我太理論性了；但誰料讀社會學的書評人反又嫌我寫得太文藝化，太多實際的例子而不夠理論化；同時喜歡文學的人問我為甚麼不多談文學，喜歡普及文化的人不喜歡我並舉文藝的例子。我又一次覺得自己吃了越界的苦頭。¹¹⁶

這是他的特點也是惹來批評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些文化研究者就由左翼理論批評他忽略政經脈絡，¹¹⁷ 這些批評有其道理，但和也斯的說法是兩個不同層面的討論，也斯感興趣的是文學問題。與其他香港後殖民學者相比，也斯最大的特點在於他同時進行創作。支撐其論述的主要不是理論，而是他的文學經驗。

四、也斯的後殖民文學作品

因此本文最後會討論也斯的後殖民文學創作，分別在詩集及小說作品各自選取一部作品，針對其作品與論述的關係，嘗試比較他在文學作品中所表達的觀點和學術論文有何異同，由此說明這種作品與論述的配合關係如何在後殖民的潮流中奠定也斯的文學地位。詩集方面，《形象香港》被最多後殖民學者討論過，這部中英對照詩集示範了他的詩怎樣與他九十年代的論述互相配合和推進。小說

¹¹⁵ 也斯：〈散文與生活態度〉，《越界書簡》，頁 176-177。

¹¹⁶ 也斯：〈散文與生活態度〉，《越界書簡》，頁 179。

¹¹⁷ 孔誥峰：〈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頁 53-88。

方面，《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是也斯最後一部小說，反映他二千年之後對香港後殖民處境的最新思考發展，格局更為更開闊，「混雜」文化觀也比九十年代的邊緣夾縫想像更能演繹香港特質。¹¹⁸

（一）梁秉鈞詩歌的後殖民詮釋：《形象香港》

《形象香港》（1992）的出版頗受後殖民學者重視。這不只是也斯的詩作英譯，而是一本新的詩集，近半的詩作未曾結集。有幾個原因令這部詩集成為眾多香港後殖民文學討論的熱門案例：詩集以「香港」為題，英文書名中「時間的終結」（*City at the End of Time*）又指涉香港回歸的命題，加上阿巴斯寫的前言〈最後的貿易王國——詩和文化空間〉把也斯視為書寫香港後殖民的代表詩人，以及譯者奧城（Gordon T. Osing）與也斯做的訪問面向英語讀者介紹香港的後殖民情況，¹¹⁹ 這部詩集遂被視為香港後殖民文學的重要文本。也斯表示此本詩集的構思「始於 1989 年」，東歐的變化與六四事件促使他「把香港放在一個與世界及其他華人城市相連亦可

¹¹⁸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同樣被很多學者視為後殖民作品討論，旅行和越界討論「後殖民」，「不在場論在場」，是自傳性極強的小說，包含大量敘述者對香港文學和文化藝術的意見，不少論者乾脆把小說的句子當作也斯的評論文章一般引用，但是如果考慮小說對後殖民論述的推進和貢獻，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更適合作為案例討論。還有一部也斯的作品和他的論述有密切關係，就是《狂城亂馬》（化名心猿發表）。《狂》雖然多有和也斯的《香港文化》若合符節之處，但是由於也斯特別為「心猿」設計了與自己不同的身份、背景和觀點，不能直接當成也斯的意見，故此不宜納入討論。

¹¹⁹ 1992 年的初版只有阿巴斯的前言與奧城的訪問作為後記，再版時加入了張美君的序及兩篇中文訪問。

資比較的位置來思索」，因此他希望「以詠物詩來面對香港的處境」。¹²⁰ 在也斯寫作《形象香港》的新作的時候，他也正在醞釀不少重要的論文討論香港的文化處境，他的詩與論文之間的呼應不難理解。以他關注的「再現」問題為例，例如描寫香港大學的〈老殖民地建築〉（1986）¹²¹ 以及詩集同名作品〈形象香港〉（1990）列出的五個人物都很可以與〈香港的故事〉批評的幾種典型的「香港形象」對讀。¹²²

但是也斯作為詩人的發聲姿態和他作為學者的論述非常不同，詩集中大部分作品都完全無意介入後殖民論述。他在論述中總是汲汲於為香港發聲、爭奪香港主體的話語權，但他的詩歌相反地卻拒絕從整體上代表香港。他的詩歌是一種「蟬鳴的詩學」，凝注於日常、微小、低迴的事物和景觀。例如阿巴斯認為梁秉鈞「不能也不想聲稱『代表香港說話』」，「並非香港社會的縮影，也沒有言簡意賅地概括香港的歷史」，與九十年代「一批又一批人站出來聲稱代表香港」不同。¹²³ 梁秉鈞的詩「精粹在於運用『小模式』」，「偏

¹²⁰ 梁秉鈞、張美君、洛楓、葉輝對談，魏家欣、郭麗容紀錄及整理：〈在時間伊始的四重奏〉，收入梁秉鈞著，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頁 254-255。

¹²¹ 〈老殖民地建築〉（1986）最尾一節以吹皺的池水比喻文字，其中反映的影像與現實的「殖民地建築」不盡相同，貫徹也斯一向對寫實主義的懷疑，反而「符號」和不穩定的影像或者引起後現代的解讀，卻才是更接近實況的。梁秉鈞：〈老殖民地建築〉，《形象香港》，頁 86。

¹²² 梁秉鈞：〈形象香港〉，《形象香港》，頁 88。

¹²³ 阿巴斯（Ackbar Abbas）著，蕭恆譯：〈香港城市書寫〉，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06。阿巴斯此文原為《形象香港》前言，題為〈最後的貿易王國——詩和文化空間〉，收入其英文專著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後有多處內容不同，

愛以平淡無奇的事物」，「是一種非異色化（de-exoticization）的做法」。¹²⁴ 這種拒絕代言的姿態與他的論述恰好相反。

既然如此，為甚麼這部詩集仍然在整體上被視為後殖民文學？有趣地，詩集中收入的舊作之所以能夠被重新闡釋為應對後殖民處境的策略，其論述基礎正是由也斯自行搭建的。各評論家所據的原因包括他企圖完全避開對香港的獵奇角度，刻意瑣碎、物質化、日常化的書寫，拒絕被收編到任何「大論述」等等。這些說法與也斯自己對香港文化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香港的故事〉所極力說明的「代言／再現」問題成為討論也斯詩作的重要角度，他力陳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大論述」不適用於香港，而論者們也正是從這角度肯定也斯詩作的價值在於其「在地」和「瑣細」。例如阿巴斯和周蕾對《形象香港》的解讀，說明了後殖民論者為什麼重視也斯的「生活化」詩歌和詠物詩，是因為當下的後殖民討論使《形象香港》裡面較早寫成的作品也因此獲致新的詮釋價值。阿巴斯的前言旨在說明「梁秉鈞的詩為何可以代表香港的後殖民處境」？而他給出非常睿智的回答：也斯是以「拒絕代表」而代表了香港詩作的特質。他認為也斯這部詩集無意提供「香港社會的縮影」或「概括香港的歷史」，¹²⁵ 相反也斯策略性地以「不說」來突顯「說」的問題：他「不自稱有代表性」，以問題化各種在九七前夕自稱代表香港的聲音，突顯它們遠遠未能完全代表香港內部各種複雜的立場和

本文兩個版本都有引用。

¹²⁴ 阿巴斯（Ackbar Abbas）著，蕭恆譯：〈香港城市書寫〉，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08、311。

¹²⁵ 阿巴斯：〈香港城市書寫〉，收入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頁 306。

意見。¹²⁶ 他認為也斯的詠物詩正正是這種策略的傑作：

如果所有例如「九七前景」等有關「人生」的「大主題」已經被寫成一些本地的「肥皂劇」，而一切有關政治局勢等的問題亦被職業政治家們所壟斷，那麼剩下來的，還可以較自由地「說話」的，就只是一些細小、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極普遍的題材及物品。¹²⁷

周蕾對也斯的詠物詩抱持相似的讚賞，儘管她的討論角度與阿巴斯不同，但兩人都認為也斯的詩突出了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她認為香港的經濟成就常常被視為殖民地缺乏政治主權的「補償」，「殖民」作為香港無法選擇的歷史，卻不失為可以利用的特點以及值得熱愛的生活，而非民族主義者所認為的悲慘處境。也斯偏偏反轉在這種論述之中被賤視的物質主義，由在地的角度描繪了殖民地上瑣細日常的生活與物質，「它們處於陳說以外，處於文字的油腔滑調以外」，¹²⁸ 是拆解「英雄式反殖民主義」，¹²⁹ 在論證時也不時引用《形象香港》中也斯的訪問。

比較也斯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的發聲姿態，詩歌不同於學術論文的體式，反而更配合也斯的後殖民觀點。他的詩歌敘述還沒有被定型或進入任何論述的香港日常經驗，由平視和流動的角度觀察都市，具體地示範了〈香港的故事〉等論文中所亟欲尋找的本地人的聲音。舉例來說，〈形象香港〉（1990）所描寫的五個角色雖然可

¹²⁶ 阿巴斯：〈最後的貿易王國——詩和文化空間〉，收入梁秉鈞著，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頁 64-65。

¹²⁷ 阿巴斯：〈最後的貿易王國——詩和文化空間〉，收入梁秉鈞著，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頁 69。

¹²⁸ 周蕾：〈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鈞〉，《寫在家國以外》，頁 137。

¹²⁹ 周蕾：〈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鈞〉，《寫在家國以外》，頁 140。

以與〈香港的故事〉批評的幾種典型的「香港形象」對讀，¹³⁰但是詩歌比論文多了一重優勢，就是它可以用文學形式擬仿香港主體的「欲言又止」：「我」希望「尋找一個不同的角度」，不被任何現存論述收編的角度，這個理想的角度「不增添也不刪減／永遠在邊緣永遠在過渡」，但尚未找到，所以兩次「我」開口時句子都懸在半空：「我們甚麼時候——」、「我們抬頭，尋找——」以至「我」反問：「為甚麼有些話無法言說？」¹³¹不同於論文需要清晰的立論和論證，詩歌可以懸擱在尋找的姿勢中，具體演示言說的困難。由此甚至可以說詩比論文更適合展現也斯的論點：「我們的想法和說法是多麼容易被其他觀點和聲音所侵吞。但總還有許多人在嘗試說香港的故事，用不同的方式。」¹³²

《形象香港》提供了一個重要案例，讓我們看到也斯的作品與論述之間互相推進的關係。也斯對香港後殖民處境的分析不只提供了研究梁秉鈞詩歌的角度，反過來亦可以說梁秉鈞的詩歌論證了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他在學術論文中力陳怎樣敘述香港的故事不

¹³⁰ 梁秉鈞：〈形象香港〉，《形象香港》，頁 88。「來自上海」的「她」總是緬懷往昔，指涉在懷舊之中無視或輕視香港的人。「在法國研究安那其主義，回來／在《花花公子》，然後在《資本》雜誌工作」的「他」，代表了嚴肅文化在香港商業文化之中的處境與最通俗的文字生產。「擅寫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狗和色情雜誌」的「報告文學好手」，代表典型的反資本主義、描寫香港罪惡的作家。「她是來自臺灣的小說家，以為自己／是張愛玲，寫香港傳奇，霓虹倒影」，批評她「不斷複印的淺水灣酒店／異國情調描繪給遠方的觀眾」，更可能是暗示施叔青。而「擅寫東方色彩的間諜小說」的「他」則影射各種對香港作東方主義式描寫及編造離奇情節的作品。

¹³¹ 梁秉鈞：〈形象香港〉，《形象香港》，頁 88。

¹³² 也斯：〈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香港文化十論》，頁 27。

會落入各種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大論述，排拒香港被「再現」，而正是他七十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提供了例子說明怎樣言說香港才是「在地的」角度，甚至可以說他作為詩人的成就讓他擁有足夠的後殖民論述資源。

（二）後民族的混雜性：《後殖民食物與愛情》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可說是也斯最重要的後殖民作品，¹³³ 被視為後九七時期的重要後殖民作品而頗受學者注目，相關評論已經不少，部分集中於同名短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¹³⁴ 較少整體地討論這部小說在也斯的後殖民論述中扮演的角色，其理論貢獻還有一些值得補充的地方。《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代表了也斯成熟而多

¹³³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

¹³⁴ 較多地提及後殖民理論的文章可參考以下三篇。趙稀方分析集中的同名短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中的聚餐場面和食物，認為體現了霍米·巴巴的「混雜」（hybridity）和「模擬」（mimicry），分別諷刺了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參考趙稀方：〈從「食物」和「愛情」看後殖民——重讀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城市文藝》，第 32 期（2008 年 9 月），頁 67-72。鄧與璋也是集中分析短篇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從身份建構、食物的雜交性、民族主義和被殖民者的話語權四方面分析，可能由於文章希望從宏觀的層面討論香港與後殖民的關係，對小說的分析可以更為細緻。參考鄧與璋：〈後殖民主義批評理論與香港文學——以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為例〉，《文學評論》，第 13 期（2011 年 4 月），頁 41-52。宋珠蘭引用肯亞文化學家提昂戈（Ngũgĩ wa Thiong'o）的《後殖民主義與非洲文學》及康科利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等人的理論分析小說中「混種」的語言及食物文化。宋珠蘭：〈也斯小說中表現出的香港混種性文化——以《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為中心〉，《香港文學》，第 340 期（2013 年 4 月），頁 50-56。

元的後殖民香港想像，其盛載的後殖民理論意涵不低於其學術論文。承接其九十年代的論述，這部小說主要探討的是在拒絕民族主義之後，香港如何走向流動混雜的身份認同，表現了他在二千年之後對香港後殖民處境的思考發展。如果香港的後殖民主體性不能夠建立在民族認同之上，那麼應該是怎樣的？九十年代也斯的論述較為重視香港作為中國的「邊緣」所遭受的壓迫，並嘗試把它轉化為優勢，集中於建構香港的「本土」空間。由上文的探討能夠看到九十年代他的對話對象一直是作為他者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敘述是香港被挪用、曲解的主要源頭，而且嘗試說明香港文學與電影與中國主流的批判性距離，強調香港與民族文化既同又異的部分，這些都是自居又自豪於香港的邊緣特質，將之化為論述的資源。到了《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他所談的重點則變成文化身份的混雜性，並刻意把身份認同的探討擴展到本土以外的全球空間，遂使整個香港後殖民論述的結構由二元變成多元。「混雜」是去除界線、更為解放性的概念，取代了九十年代「邊緣」及「夾縫」的想像之中「民族主義」與「本土」的「中心／邊陲」、「強勢／弱勢」的二元對立結構，不只更有利於香港主體的自我充權及發聲，而且更適合帶出香港內部的不同特質，也更易於容納他者。

這個由「邊緣」到「混雜」的理論重心改變，不只體現在也斯的創作上，九七過去後學術界有更多的餘裕從更大的格局上檢討反思香港的後殖民問題，討論的重點也由民族主義論述帶來的焦慮變為世界主義的思維。李歐梵和陳冠中分別都以「多元文化」的不同詮釋來應對回歸後香港在區域角色的變化。例如李歐梵提出「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他思考的是香港未來的定位，在成為一個中國城市或世界城市之間，只有後者可以保有香港的優勢和獨

特性，香港雖然號稱國際大都會，卻仍然缺乏對世界多元文化開放的心態。¹³⁵ 世界主義類近九十年代已經開始討論的「混雜」的意思，也是對香港特質的掌握和發揮。又例如陳冠中先後提出香港文化是「半唐番」和「雜種」的城市文化。用「雜種」來翻譯「混雜」最初是李歐梵的用法，¹³⁶ 陳冠中則對「雜種世界主義」大加發揮，既重視自我身份認同又強調與異文化的溝通交雜。¹³⁷ 陳更說是也斯的〈香港的故事〉啟發了他尋找香港的聲音。¹³⁸ 「混雜」、「世界主義」和「雜種」文化是相似的思考方向，可見也斯提出「混雜」來把握香港特質同屬這一股新的「後民族」後殖民思潮。九十年代也斯已經談過混雜，¹³⁹ 雖然當時他被劃為「混雜派」的一員，¹⁴⁰ 但是現在看來當時他談論的「混雜」並不是挪用風行一時的霍米·巴巴，而主要是來自他對香港文學語言的觀察，認為語言混雜的狀況可以視

¹³⁵ 李歐梵：〈香港文化定位：從國際大都市到世界主義〉（2012），收入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2016年），頁 78-83。

¹³⁶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第 28 期（1995 年 1 月），頁 80。

¹³⁷ 陳冠中：〈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2005），《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7-59。

¹³⁸ 陳冠中、李歐梵：〈香港作為方法〉，收入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頁 136-137。

¹³⁹ 他當時說都市「成員的身份是混雜而非單純的」，其中又以香港特別混雜，這是由於殖民經歷的緣故，令香港不同於中國其他城市。但是他的說明重點明顯不在文化或歷史上，而是放在純文學的表現上，集中討論香港文學的定義問題以及香港作者的書寫語言問題。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36-38。

¹⁴⁰ 參考葉蔭聰在「北進想像」專輯的文章，葉蔭聰：〈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香港文化研究》，頁 35。

為都市文化的特點。¹⁴¹到了二千年之後，他寫作《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時候對「混雜」有更精彩的詮釋，比起他九十年代的論文更進一步地推展了香港後殖民論述。理論風潮時常更替，但是即使在混雜理論不再是學院新寵之後，也斯對香港文化的混雜性的觀察卻仍然是準確的。

「混雜」是後殖民理論為了否定民族主義對「純粹」、固定、本源式的身份認同而提出的概念。混雜理論之中，以巴巴最為人熟知，巴巴借用語言學的隱喻提出所謂的「第三空間」，認為既然「所有文化都在某程度上與其他文化相關，因為文化就是一個指涉（signifying）或符號的活動」，那麼所有文化都是依賴「他者」而界定的，它們都是去中心的結構。¹⁴²因此沒有任何文化可以宣稱它們是原生的（originality）、純粹的（purity）或從一開始就是統一固定的。文化的意義就在於「之間」（the “inter”, the in-between space）。¹⁴³但是巴巴不是唯一談論過「混雜」的理論家，他的理論是各人之中最抽象的。「混雜」主要運用在探討拉丁美洲的後殖民處境。克里迪（Marwan M. Kraidy, 1972-）整理「混雜」概念的來龍去脈，指出在殖民初期，歐洲殖民者很恐懼被殖民地土著「污染」，例如以科學論證土著是全然不同的物種。隨著時間過去，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混雜」卻不可避免地發生，不少描述「混雜」

¹⁴¹ 也斯：〈都市文化・香港文學・文化評論〉，《香港文化十論》，頁 36-37。

¹⁴² Jonathan Rutherford,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10.

¹⁴³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53-56.

的概念都是來自描述美洲的種族混雜，例如融合主義（syncretism）、跨文化主義（transculturalism）、克里奧爾化（creolization）等等。¹⁴⁴ 在後殖民理論中，「混雜」代表了後殖民文學及文化生產的關鍵面向，例如巴巴的「混雜」是一種被殖民者賴以抗衡殖民者的策略，薩伊德反對民族主義而認為文化總是混雜的，吉羅伊（Paul Gilroy, 1956-）反對任何形式的種族本質主義和民族主義，或以文化純粹性排斥異質，他認為需要把實際上種族混雜的情況理論化，以作描述和理解。¹⁴⁵ 「混雜」受後殖民理論家高度讚賞，但同時被批評理論脫離實際後殖民狀況，例如德里克極為尖銳地諷刺「混雜」作為理論概念是極為含糊的，是與實際的第三世界無關的時髦文化理論；¹⁴⁶ 它又是去地方化的，令「後殖民」變成一面沒有特定地理指涉的大旗幟。¹⁴⁷ 同時「混雜」又被認為是擁抱跨國資本主義邏輯，畢竟所謂的「混雜」只是權力容許的混雜，不能忽視背後的歷史原因是殖民主義改變殖民地，文化之間是不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主要

¹⁴⁴ 融合主義指基督信仰在拉美的本土化（inculturation），跨文化主義指涉兩種文化互相改變的情況，延伸至文學藝術上文化混合的情況甚至顛覆的潛能，克里奧爾化原指殖民者輸入美洲的非洲黑奴與美洲文化的混雜。Marwan M. Kraidy,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8-57.

¹⁴⁵ Marwan M. Kraidy,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p. 58-60.

¹⁴⁶ Arif Dirlik, "Bringing History Back In: Of Diasporas, Hybridities, Places, and Histories," in *Beyond Dichotomies: Histories, Identities, Cultures,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Elisabeth Mudimbe-Boyi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 105.

¹⁴⁷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No. 2 (Winter, 1994), p. 332.

由國際關係的等級決定。¹⁴⁸ 克里迪總結指，混雜仍是有力的理論，關鍵是要把「混雜」放在具體的脈絡中檢視研究。借用以理解《後殖民食物與愛情》，我們當然可以質問也斯是否有把「混雜」本質化之嫌，但是與其固著於無所不在的「本質主義」質疑，還不如實際地看他把混雜放在甚麼脈絡、有否寫出香港的味道來得更有意思。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集結了十三個故事，¹⁴⁹ 有一半的故事地點是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展現出極為開闊的世界版圖。小說所選的地方都與香港關係密切：港人非常崇拜熱愛的日本、與香港同期回歸的澳門、港人移民大本營溫哥華、同為南方前殖民地的越南等。書後他形容此書的構思：「我當時不想循已成定論的方法寫香港，也不想只顧迷戀肚臍眼只看香港。九七後我對香港與亞洲或其他城市關係更感興趣」¹⁵⁰。可以說也斯有意寫出香港文化的異質部分，他說：「他異的經驗從一開始就是香港經驗的一部分」，「香港也不一定是在香港的範圍以內了」。¹⁵¹ 與他九十年代的後殖民論述相比，此時他的思考格局已經不只侷限於香港本土，而更多地放在東亞以至世界之中審視香港的角色。

綜觀全書呈現的香港是「色、香、味、人、情」俱全的，「混雜」因而並不只是抽象的理論概念，與學術論文的觀點相得益彰。小說

¹⁴⁸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pp. 66-68.

¹⁴⁹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2009年初版包括十二個故事，2012年修訂版增加至十三個，部分篇章名稱也有不同，此處以修訂版為準。

¹⁵⁰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373。

¹⁵¹ 也斯：〈嗜同嗜異——從食物看香港文化〉，《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05年），頁165-166。

由食物的形容、人物的背景設定到愛情關係全都表現出「混雜」的特點。一切都是多國籍的，食物固然是，例如派對上的多國美食、¹⁵² 法國與泰國菜混合而成的「後殖民食物」；¹⁵³ 人物亦刻意設定為多國文化背景，例如何方的學生阮是在香港長大的越南人、鹹蝦醬愛上的老大的女人是中葡混血兒。即使塑造某些人物以對應特定的文化階層，也不忘加入一些不那麼純粹的細節令他們感覺較為真實，例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瑪利安的父親代表前殖民地的上流階層品味，但特別提到他會講究地道炒河和掌管中菜。也斯對「混雜」寄予厚望，例如在史蒂芬身上就看出他認為混雜比純粹好，雅俗揉雜比徹底的高雅好，史蒂芬強調自己口味廣闊，¹⁵⁴ 比起頂尖的法國菜反而更喜歡法國及泰國菜融合的新菜色，跑到蘭桂坊吃川菜等等，又認為高級餐廳和街邊小店都是食物文化的一部分。¹⁵⁵ 連愛情也是混雜的，〈濠江殺手鹹蝦醬〉的兩層故事都是多角／多國戀愛糾纏不清，〈尋路在京都〉和〈愛美麗在屯門〉則寫居港多年的美國人羅傑和香港女孩阿素的愛情故事。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因為脫離了以往「民族他者」與「香港主體」的二元對立格局，而能夠更深入地表現不同身份的香港主體，盡量避免本質化的陷阱。同為愛情故事，把《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與《剪紙》比較就更為明顯。《剪紙》代表的是「夾縫」想像，喬和瑤的重像式設計分別代表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以黃對喬的感情、瑤對唐的幻想敘述一個「香港」盲目愛慕中國或西方文化的故事。

¹⁵²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

¹⁵³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3。

¹⁵⁴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1、24。

¹⁵⁵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4。

事。這樣的設計或許致令沒有太多篇幅表現的香港主體性稍嫌單薄朦朧，顯示了「夾縫」想像主要是關於與外在他者的關係，而不利於深入了解香港內部。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代表的是混雜的、世界主義的想像，更有利於表述香港的主體性。以〈愛美麗在屯門〉羅傑和阿素（愛美麗）的愛情故事為例，羅傑居港多年，在大學教英文，「他羅傑何嘗想過要做殖民地上佔盡優勢的外國紳士呢！」¹⁵⁶ 阿素的名字讓人想起蘇絲黃，但他和阿素的關係不是《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 1957）代表的傳統殖民者與香港女子的權力關係，「總有各種各樣不同類的外國人，也有不同類型的香港女子吧」。¹⁵⁷ 羅傑喜歡香港文化，成為了一個「吃中藥的鬼佬」，¹⁵⁸ 他沒有假裝自己因此就是「香港人」，「他之為他的部份……不會因為表面地坐在茶餐廳裡便會立即消失無蹤的」。¹⁵⁹ 他和阿素的文化差異始終存在，例如他偏好英國茶而阿素只喜歡大排檔奶茶，他們的早餐選擇南轅北轍，他喜歡西式水煮蛋而她喜歡沙爹公仔麵，他喜愛的美國詩人和嬉皮文化對她來說就像是西餐碟伴永遠不吃的生菜絲。¹⁶⁰ 羅傑和阿素的文化編碼落差令人想起《剪紙》中黃和喬的隔膜，喜歡中國古今詩詞的黃與喜歡西方流行音樂的喬最終釀成悲劇。¹⁶¹ 但是這次羅傑和阿素的故事卻強調跨文化戀愛而不是溝通的失效，兩人最後分手不是因為文化不同，而只是事業前途的追求不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的混雜文化觀就突破了前此

¹⁵⁶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61。

¹⁵⁷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61。

¹⁵⁸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57。

¹⁵⁹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62。

¹⁶⁰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60。

¹⁶¹ 也斯：《剪紙》（香港：素葉，1982 年）。

的「夾縫」想像，這次香港主體完整地發聲了，羅傑和阿素分別代表不同成長背景、不同文化品味的香港人。這個例子恰好可以說明「混雜」比「邊緣」或「夾縫」的想像更有利於敘說香港的故事。

小說主要以食物具體地表現各種混雜的後殖民文化與權力關係。老薛要寫一本關於香港食物的大書，由食物看香港的文化、歷史、政治等等，¹⁶² 其實是後設地指涉《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還有詩集《蔬菜的政治》的核心構思。小說中有不少地方故意運用理論術語來形容食物，在在表現出「由食物看文化政治」的野心，以下可以舉三個例子看看食物背後的後殖民意涵。

第一個例子針對全球化與後殖民的關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稱泰國菜為「後殖民食物」：「混合了不同東西文化的食譜，帶著法國風味，又有獨立的泰國的辛辣與尊嚴」，但是餐廳部長否定這樣的後殖民身份，自稱「新派的法國菜」，具體的「泰國」被隱沒在廣義的亞洲味道之中，因為泰國菜在香港不受追捧。史蒂芬期待亞洲菜能和法國菜平起平坐，但他也明白所謂「泰國風情」本是歐洲人對遠東的想像，而在香港追逐的是高貴的法國餐廳。¹⁶³ 這個短短的片段藉由食物的混雜象徵後殖民亞洲由「市場」而決定價值高低和身份的顯隱，對於在「混雜」中被抽空和掩蓋的獨立文化身份以及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運作非常警覺。

第二個例子則是關於民族主義論述的。也斯在小說中的看法比他九十年代的論文更為豐富仔細，集中在香港內部的不同立場，同時又擴展到在世界格局中審視香港文化，不再只把焦點放在中國與香港的角力與對立上，而是更細緻地表現個體的民族認同的不同層

¹⁶²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92。

¹⁶³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3。

次，體認不同立場的香港主體，展演香港的文化政治。例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一邊重申也斯的基本立場，即認為香港的價值在於對民族主義認同的疏離與批判，一邊讓民族主義者老薛出場。小說描寫回歸晚宴的電視直播，席間本地傳統家常菜都在民族主義的偉大修辭下被扭曲疏遠，而敘述者史蒂芬和他的朋友們則嘲笑名實不符的菜式沒有帶來愛國情懷只是產生滑稽的效果，¹⁶⁴ 明顯象徵也斯一向反對的民族主義宏大論述根本脫離以食物代表的本地現實。可是這篇小說不只是把「民族主義」設定為外在的他者，而是同時設計了擁護「民族主義食物」的香港人老薛。他們在蘭桂坊聚餐時，老薛等人連番批評這間意大利人開的四川餐廳不夠純粹。¹⁶⁵ 老薛是另一篇小說〈溫哥華的私房菜〉的主人公，這篇小說為了配合老薛較為傳統的口味，敘述語調戲戲化，加入刻意的政治修辭，並特別在每一節結束前加入說書人的「下場詩」。老薛自稱「我只在食物方面是愛國主義者」，¹⁶⁶ 他和朋友就溫哥華還是香港的飲食更多姿多彩而爭持不下，又把移民加國的子女對西菜的偏好說成「西風壓倒東風」，¹⁶⁷ 背後是移民的文化認同問題。¹⁶⁸ 對於老薛這樣的「讀書時關社認祖的國粹派」，也斯在學術論文中處理不多，小說卻提供了空間深入理解這個人物，而民族情懷在老薛心目中也遠不及家庭的重要性，同時表現了一個人在不同層次上的身份認同。也斯一方面在世界版圖上回看香港文化（以中菜和私房菜為象徵），另一方面又把焦點放回香港內部的複雜性，反而能夠體認不同的香港立

¹⁶⁴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7。

¹⁶⁵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5-26。

¹⁶⁶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73。

¹⁶⁷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72。

¹⁶⁸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74。

場，更貼合香港現實。

第三個例子是關於「混雜」本身的。〈艾布爾的夜宴〉講述一群香港人分別由世界各地來到西班牙巴薩隆那一嚐馳名的艾布爾（El Bulli）分子美食餐廳。分子美食顛覆食物的觀念，一如「混雜」顛覆傳統的文化觀念。分子美食是反本質主義和反原教旨主義的最佳象徵，對分子美食而言沒有所謂的「本質」、「純粹」，一切可辨的國族界線都被消除，就像文化本來是混雜的，放在後殖民語境下解讀有極為豐富的意涵。食物不再由原本的形貌、本質、味道來定義自身，「他們把物的形狀改變了」，「味道和常見的製作方法改變」，有些食物「改變了形貌，卻又尋回它們的味道」。¹⁶⁹篇中甚至用上佛家和道家思想來形容這個食物革命，「見山不是山，見山是山」，¹⁷⁰「大音無聲。大象無形」。¹⁷¹〈艾〉還是一個鬼故事，令人聯想到在後過渡時期香港電影湧現的「鬼片」被視為恐懼未來或依戀懷舊的投射。¹⁷²〈艾〉講述當天下午已經車禍去世的年輕人史和覓在晚上如期赴約，享用「最後的晚餐」——他們的名字「（尋）覓（歷）史」饒有深意，小說形容他們「從一個相對安穩

¹⁶⁹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80。

¹⁷⁰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80。

¹⁷¹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86。

¹⁷² Emilie Yueh-yu Yeh and Neda Hei-tung Ng, "Magic, Medicine, Cannibalism: The China Demon in Hong Kong Horror," *Horror To the Extreme: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edited by Jinhee Choi and Mitsuyo Wada-Marcian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5-160. 另外，也斯曾在 2012 年與何慶基等人合辦香港「鬼文化節」，其中包括鬼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內容請參考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網址：<http://www.ln.edu.hk/chr/Html/ghostculturalconferenc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的小島環境出來」，在到達「不知是好是壞的未來」之前就意外死亡。¹⁷³「鬼」和「分子美食」都是後殖民隱喻，兩者加起來令這篇小說充滿疑幻疑真的氣氛，或許是暗示後九七的全球化流動時代之中，香港的命運並沒有更為明確。

食物的混雜還象徵香港人對異文化兼容並蓄的「好胃口」。也斯形容「我們基本上沒有一副民族主義的排他腸胃」，¹⁷⁴他通過羅傑表達「混雜」是香港的優勢，羅傑覺得在日本常常感到自己被拒諸門外，在香港卻「好似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生存的空間」，¹⁷⁵香港充滿各種政治立場、宗教、性取向都差異極大的人群，暗示正是這點令他願意成為香港人。¹⁷⁶愛美食的胃口本來就不需要講究國族認同忠誠或堅持民族界線，鍾情中菜也可同時欣賞西餐，喜歡吃地道小食不代表就要排斥其他菜式。食物又必定隨著傳播路徑而適應當地文化習慣，徹底的「純粹」和「本源」反而是少數的堅持和刻意為之，因此食物很好地演示了後殖民理論對民族主義的批評。

最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還演示了小說作為後殖民理論載體的優勢。其一，小說示範並落實他在論文中提出的觀點。以他對宏大論述的排拒為例，《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界乎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集之間的設計一反傳統的線性敘述結構，¹⁷⁷加以題材上把大歷史褪到背景，前景是來去匆促的愛情故事（例如史蒂芬與瑪利安的故事背景是香港回歸，鹹蝦醬的故事背景是澳門回歸），一律都是

¹⁷³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84。

¹⁷⁴ 也斯：〈嗜同嗜異——從食物看香港文化〉，《也斯的香港》，頁 164。

¹⁷⁵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31。

¹⁷⁶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61。

¹⁷⁷ 《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雖然由十三個短篇小說組成，但是部分篇章的人物和故事設定是互相承接的，各篇共同組成一個更大的故事。

把他對「大論述」的反感落實到小說設計上。他在後記中暗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表明自己志不在此：

寫大時代的歷史，大家從五四以來都是寫三部曲。好像三部曲就是一道道宴客的主菜，把你吃得飽飽的。照足歷史的公式。滿漢全席。應有盡有。全面兼顧的結構。我有時倒想吃街頭小吃呢！我想設計一桌不那麼飽膩的小菜。¹⁷⁸

這段話以食物為喻，觀點和他以前的學術論文仍是一致的，並且貫徹整個小說的各個細節。

其二，他以最通俗的食物和愛情的故事寫出普及版本的後殖民理論，意圖超越被指斥過於抽象、去地方化的、精英主義的理論，直接回到他身為作家所把握到的香港文化感性。背後雖有理論思路，文本上化為具體的情節、食物、愛情卻能直接表現真正的「混雜」狀態。以〈愛美麗在屯門〉為例，小說先是誇大中環與屯門之間的城鄉差異，以愛美麗（阿素）代表珍視本土的香港人，以愛時髦代表崇洋的香港人。故事充滿有趣的混雜文化，刻意把異國世界與本土香港交錯拼貼，例如「愛美麗」的名字是來自法國電影《天使愛美麗》，她卻帶著白瓷觀音四處享用香港地道美食以替父親祈福，「讓神靈與海鮮合拍一照」，¹⁷⁹ 有人說她是在蒙馬特出生而其實她是在元朗B仔涼粉樓上出生的，¹⁸⁰ 處處設計了混雜的本土風味，而且這些「混雜」不是理論而是香港每天的日常現實。與也斯的論文相比，小說的寫法更有利於他提煉其個人體會和表現香港文化。

¹⁷⁸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370。

¹⁷⁹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46。

¹⁸⁰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137。

若要吹毛求疵的話，小說或者可以寫得更為「普及」，不少人物的原型相信是來自也斯個人的經驗，例如在學院任教的羅傑和何方，史蒂芬和老薛的文藝趣味和寫稿經驗等等，如果能夠更為貼近民間的話或者更能貫徹小說的「世俗化」傾向。

其三，小說可以做到論文所不能達到的多視點敘述。小說的人物設定容許敘述者成為也斯論文中的「他者」，例如以外國人為視點形容香港文化和他們在其中的處境，並謹慎地沒有讓故事外敘述者對人物加以評斷。對於他在論文中批評的對象，小說可以賦予更多同情，例如曾經是追隨左派思想的老薛和日本漢學家小澤老師，在小說中他設計了筆下的左派分子反省及悔改從前的左翼信念。¹⁸¹但是這部分的描寫不深，小說中表現的觀點沒有完全超出他的論文探討的範疇，他在學術論文中未有深入討論香港的左派文學，在這部香港的食物文化史中也不免是缺少了左派的角度。

概括以上對也斯的後殖民作品的討論，《形象香港》說明他的詩與後殖民論述怎樣互相配合和推進，《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精彩地描寫了混雜的香港文化，除了比九十年代的邊緣夾縫想像更能演繹香港文化之外，也把「混雜」的理論概念具體落實至最為世俗的食物和愛情，表現香港日常的混雜現實。也斯作為一個同時進行文學創作的學者，其作品與論述的關係特別值得重視。

五、總結

也斯的香港後殖民論述，特點在於他的個人文學經驗和對香港文化的觀察，例如他討論被殖民主體的文化問題就非常敏銳深入。

¹⁸¹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頁 223。

反觀理論的部分談得不算多，主要是採用「越界」的寫法，介乎散論與學術論文之間。另一方面，由於其論述主要由個人文學經驗而來，他對民族主義的討論更接近個人的文學評論和立場表述。與其他香港後殖民學者相比，也斯最大的特點在於他同時進行創作。他的後殖民論述是一名文學家所做的文化研究，這是他的特點也是曾經遭受非議的原因所在。他由文學形式思考後殖民主體的再現問題，傾向把文化身份問題轉譯為文學問題。這些都可見也斯的家文學家本色，和其他後殖民學者不同。他的文學經驗支撐了他的後殖民論述，同時又以文學創作參與香港後殖民書寫，與他的學術論文互相配合，構成了香港後殖民論述的重要一頁。

也斯在八、九十年代對香港後殖民問題的思考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香港和英國，這點與當時學術界的傾向相同。後殖民理論為拆解民族主義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支援他論證民族主義不是香港解殖方向，同時令他警惕再現和權力的關係。由此民族主義成為了「香港」的關鍵他者，賴以界定香港文學的處境、特點和優勢，是他的香港文學史論述中的重要部分。他努力想論證香港這塊邊緣的殖民地如何改變了來自中原的南來文人的正統文學風格，強調香港的角色和重要性。他以香港為本位、力抗以民族主義論述為首的對香港文化的任何扭曲，這點也是很多後殖民評論家認為香港最重要的特質。而在這以外，香港文學之中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和嚮往其實也很值得納入香港文學史的框架之中討論，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不同年代、不同政治立場的香港作家的身份認同。

本文嘗試探討也斯在香港後殖民論述及文學上的重要性。首先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的早期文章，檢視也斯如何在對美國非裔藝術及拉丁美洲文學的關注中已經初步觸及種族主義、殖民經驗與後

殖民的問題，這些思考更部分反映在他早期的小說和評論之中，其中拉美文學更啟發他思考香港殖民問題和建立本土文化認同的重要性。接著整理了他援引的後殖民理論資源，說明他對後殖民處境的理解，包括借助法農的理論發展早期體會到的問題，關注香港被「再現」的「東方主義」問題，以及運用後殖民理論嘗試拆解民族主義、提出香港的後殖民理論價值在於與民族主義的批評距離。最後，有見於也斯是在眾多香港後殖民學者中極少數兼擅文學創作的，本文討論了《形象香港》和《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這兩部後殖民文學作品，探討其中和論述或有所配合、或有所推進發展的關係，以完整呈現也斯所建構的後殖民香港圖景。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也斯：《剪紙》，香港：素葉，1982 年。。
2. 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 年。
3. 也斯：《香港文化空間與文學》，香港：青文，1996 年。
4. 也斯：《越界書簡》，香港：青文，1996 年。
5. 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05 年。
6. 也斯：《書與城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年。
7.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年。
8. 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
9. 也斯：《也斯的五〇年代：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2013 年。
10. 也斯：《煩惱娃娃的旅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11.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臺北：麥田，1997 年。
12. 吉爾伯特（Bart Moore-Gilbert）著，陳仲丹譯：《後殖民理論——語境、實踐、政治》，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
13. 朱耀偉：《本土神話：全球化年代的論述生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 年。
14. 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2016 年。
15. 余麗文：〈香港的故事：也斯的後殖民話語〉，收入黎活仁、龔鵬程編：《香港新詩的「大敘事」精神》（嘉義：南華管理學院，1999 年），頁 163-190

-
16.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
 17.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2013 年。
 18.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1995 年。
 19. 張美君、朱耀偉主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20. 梁秉鈞：《當代拉丁美洲小說選》，臺北：環宇，1972 年。
 21. 梁秉鈞著，奧城（Gordon T. Osing）、梁秉鈞譯：《形象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年，再版。
 22. 梁秉鈞編譯：《美國地下文學選》，臺北：環宇，1971 年。
 23. 章輝：《後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24. 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香港：牛津，2007 年。
 25. 陳炳良編：《中國現代文學新貌》，臺北：學生書局，1990 年。
 26. 陳素怡編：《也斯作品評論集（小說部分）》，香港：香港文學評論出版社，2011 年。
 27. 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
 28. 陳清僑編：《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9.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2000 年。
 30. 黃子平：《害怕寫作》，香港：天地，2005 年。
 31. 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 年。
 32. 德里克（Arif Dirlik）著，馮奕達譯：《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臺北：衛城，2018 年。

33. 薩伊德著，黃德興、劉慧儀譯：〈東方論述・導引〉，收入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解殖與民族主義》，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9-59。
34.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
35. 羅鋼、劉象愚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36. Bhabha, Homi.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7. Fanon, Frantz. *The Fanon Reader*. Edited by Azzedine Haddour. London: Pluto Press, 2006.
38. Kozlarek, Oliver. *Postcolonial Reconstruction: A Sociological Reading of Octavio Paz*.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39. Kraidy, Marwan M. *Hybridity: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Globaliz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0. Lin Li-ying, *History,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2008.
41. Paz, Octavio.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translated by Lysander Kemp, Yara Milos & Rachel Philips Belash. New York: Grove, 1985.

二、期刊論文

1. 也斯：〈加西亞・馬蓋斯與「一百年的孤寂」〉，《四季》，第 1 期，1972 年 11 月，頁 89-99。
2. 也斯：〈兩種幻象〉，《號外》第 15 期，1977 年 11 月，頁

36-38。

3. 也斯：〈無家的詩與攝影〉，《娜移》，第2.2期，1993年2月，無頁碼。
4. 孔誥峰：〈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風暴看香港夾縫論〉，《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1995年9月，頁27-45。
5. 宋珠蘭：〈也斯小說中表現出的香港混種性文化——以《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為中心〉：《香港文學》第340期，2013年4月，頁50-56。
6. 李歐梵：〈香港文化的邊緣性初探〉，《今天》第28期，1995年1月，頁75-80。
7. 梁秉鈞主編：《香港文化專輯》，《今天》第28期，1995年6月，頁71-206。
8. 陳智德：〈「回歸」的文化焦慮——1995年的《今天·香港文化專輯》與2007年的《今天·香港十年》〉，《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6月，頁65-90。
9. 葉蔭聰：〈邊緣與混雜的幽靈——談文化評論中的「香港身份」〉，《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1995年9月，頁16-26。
10. 趙稀方：〈從「食物」和「愛情」看後殖民——重讀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城市文藝》第三十二期，2008年9月，頁67-72。
11. Dipesh Chakrabarty,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 Who speaks for 'Indian' Past?" *Representation* 37, Winter 1992, pp. 1-26.
12. Ella Shohat,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no. 31/32, 1992, pp. 102-111.

13. Emilie Yueh-yu Yeh and Neda Hei-tung Ng, "Magic, Medicine, Cannibalism: The China Demon in Hong Kong Horror," *Horror to the extreme: changing boundaries in Asian cinema*, edited by Jin-hee Choi and Mitsuyo Wada-Marcian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5-160.
14. Frantz Fanon, "On Nationalism," in Diana Brydon ed.,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0, vol. II, pp.443-469.
15. Jonathan Rutherford, "The Third Space: 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07-221.
16. Leung Ping-kwan, "Modern Hong Kong Poetry: Negotiation of Cultures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 1996, pp. 221-245.

三、學術論文

1. 梁志華：《從〈剪紙〉、〈煩惱娃娃的旅程〉論也斯筆下的都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1982 年。

四、報紙

1. 也斯：〈金龜婿與荷蘭人〉，《香港時報》，第 10 版，1968 年 8 月 2 日。
2. 也斯：〈兩位黑人作家的觀點〉，《香港時報》，第 10 版，1968 年 11 月 20 日。